

# 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

余貞誼

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大學中受過女性主義訓練，進入媒體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們，當她們在敘說自己實踐女性主義的經歷時，大多吐露一種自己不夠女性主義的焦慮，這種焦慮集合起來便形成一個公共議題：是什麼因素引起此一致的歉意？本文從敘事研究的角度，透過將道歉敘事放置在它所鑲嵌的女性主義社群，探討社群文化框架中的敘事典範和主流情節輪廓如何滲透進這些敘說者的生命經驗，使她們以框架中蘊含的價值、成就和道德義務來組織和詮釋生命中的事件，因而認知到自己行動與理想典範間的差距，並將此差距詮釋為一種反責自我的歉疚。透過這樣的討論，道歉敘事不再只是個人實踐行動後的自省，而更深化為一種文化框架的再生產過程，讓我們看到個人敘事與更大的文化結構間的交織作用，並且使此歉意超越個人煩惱的層次，成為女性主義發展的公共議題。

關鍵詞：敘事、女性主義、認同、實踐、文化框架

## “Maybe I’m Not a Qualified Feminist”: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Feminism Identity and Practice

Chen-Yi 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ving received feminist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feminists who have become media workers tend to reveal an anxiety — “maybe I’m not a qualified feminist” — when narrating their feminist practice experience in the workplace. When these anxieties gather together, they become a public issue and attract attention to the causes of their collective apology. Using the narrative approach, the author puts these apologetic narratives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feminist community to explore how the narrative exemplars and popular plot outline of feminism culture frameworks penetrate the narrators’ life experiences, and lead them to organize and interpret life events with values, achievement,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embedded in the frameworks. In this case, narrators often perceive a gap between ideal models and their actions, and interpret the gap as their fault for which they should apologiz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pologetic narratives are not only self-reflections, but also represent a deeper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culture frameworks in which personal narratives interact with a larger cultural structure, going beyond personal troubles to public issues.

*Keywords: narrative, feminism, identity, practice, culture frameworks*

## 一、導言：問題緣起

2004年的春天，我在碩士論文的撰寫過程中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訪談，主題是針對從大學教育中受過女性主義訓練，並以女性主義立場自許的媒體工作者在職場中的女性主義實踐經驗。進入田野後，我看到人們經由不同的角度和基點建構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和實踐行動，並將複數的女性主義展現在這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多元故事之中。但是，弔詭的是，在這充滿啟發性的訪談過程中，我卻不時覺得有一個共通的和弦交織在這些個別譜唱的曲調之內。這個和弦所訴說的，是無論她們做了多少努力，每個人都懷有一股愧對所學、「不夠女性主義」<sup>1</sup>的歉咎和不安，在訪談中或隱或顯的吐露自己雖然有女性主義的認同，但行動的方式卻不夠女性主義。由此，女性主義的認同與實踐似乎變成兩個相互對望的端點，橫斷的彼端遂成了「不夠格」的實踐與「對不起」的認同。

在當時，面對這種因認同與實踐間的落差而衍生的歉疚，我只將之歸諸於職場環境的現實不利於女性主義的實踐，使受訪者在回顧自我學習和實踐的歷程時，才會在自省中油生愧疚，認為自己沒有將女性主義的能量發揮至職場上。這樣的理解對照至台灣女性主義社群累積的研究文獻來看，是有其根源的。目前談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研究，大致循著意識認同與行動策略這兩個軸線來談。前者談性別意識／女性主義意識的生成過程及內涵（王雅各 1998；黃燕萍 2001；畢恆達 2003, 2004；卯靜儒 2004；王儷靜 2005），後者則談此意識所帶來的實踐行動策略和反省（劉惠琴 2002；王儷靜 2004；顧燕翎 2005；楊幸真 2007；蕭昭君、林昱瑄 2007）；此外，也有透過生命史的方式將上述兩軸線連結起來，呈現行動者一路從意識萌生至行動改革的經驗歷程（林昱貞 2001；鄭瀨姘 2001；游美惠 2002；蕭昭君等

---

1 引自受訪者葉子在訪談中的話語（訪談記錄 F03）。

2002；Chen 2004；蕭昭君 2004）。在這樣的框架下，女性主義的認同與實踐就像闖關遊戲中設立的關卡般，我們想望的都是突破關卡後的成果，因而關卡間的經歷都只被視為一種過渡，只要假以時日或給予資源便可跨越前進。但我們很少去探問，我們所想望的關卡是怎麼建構出來成爲砥礪我們前進的動力。因此，當我的受訪者在自陳「不夠女性主義」的歉疚時，我也以既存文獻框架的觀看視角，將之詮釋爲無法突破關卡而生的歉疚，而忽略她們眼中的「關卡」究竟是如何被建構出來，並且成爲詮釋自我經驗的標的。

然而，如此的忽略很可惜的錯失此歉意說詞背後更爲深刻的意義。首先，如同 Candace West 與 Don H. Zimmerman (1991: 13-24)在「做性別」(doing gender)的論點中所主張的，性別是社會行動(social doing)的產物，是在和他人的互動中從事及反覆從事的事物。同樣的，「做女性主義」(doing feminist)也是行動者服膺情境和場合的需求來組織行動，使自我行爲成爲可被說明的(accountability)一種成就(accomplishment)；而要成爲可被說明的，便意味著這些行動鑲嵌於一種社會關係之內，並源自於此關係所運作的制度場域。因此，不僅是認同與實踐本身構成「做女性主義」行動的一環，個人如何理解和敘說自我的認同和實踐，並使這些敘說接受他人的評價，都是「做女性主義」的一部分。所以，「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敘說本身，並不只是「做女性主義」行動中的暫時性過渡，而更反映了「做女性主義」所涉及的制度場域和社會關係。對這些敘說進行探究分析，能讓我們更爲理解「做女性主義」行動在台灣社會的情境脈絡和發展契機。

其次，「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說詞固然蘊含著個人因爲力有未逮而生的歉意，但它卻不僅只是個人自省。如同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個人的即政治的；當我們將個人的故事集合起來時，就能顯示出不同的觀看、思考和存在的方式(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 14)。而此種觀點的移轉，正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 (1995: 34-38)所強調的社會學想像，透過把個人經驗定位於歷史結構中，使發生在個人情

境中的煩惱成爲社會結構的公共議題，讓我們從個人傳記與歷史結構的交錯互滲中，更爲深刻的理解個人傳記的意義。因此，在我們將這些個別的「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解讀爲一種向現實妥協後的自省時，同時也應該留意當這些個別道歉聚集起來時，它能傳達何種不同的意義，以讓我們更爲理解事實的多重面向。

最後，更需要注意的是，我所蒐集到的個人故事皆來自於訪談形式。訪談是一個人造的社會相遇的特殊形式(Ribbens 1989: 579)，其中的敘說會依據脈絡、聽衆和敘說媒介的慣例而有所改變(E. Bruner 1986: 146)。因此，將訪談視爲研究資料的取徑，不應只關注訪談內容，單純將其視爲事實的翻版；而應該將訪談本身視爲研究的對象，探查說者的故事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及文化來源下構築而成的。換言之，受訪者所敘說的故事，並不是外在世界的鏡像反射，而是說者和聽者共同建構出來，一種充滿修辭、假設和解釋的互動創作。因此，我們在研究中要問的，不僅只是訪談所指涉的內容，而是，這個故事爲什麼是這樣說的(Riessman 1993: 2)。如同 Jerome Bruner (1987: 31-32)所言，生活並不是「它是什麼樣子」，而是它如何被詮釋和再詮釋、被敘說和再敘說。所以，當我們要理解任何人述說的故事時，比較好的理解方式是，去思考這個故事可被敘說的其他可能方式。

所以，本文將透過敘事的角度，<sup>2</sup>來討論受訪者的道歉故事爲什麼是這樣說的，以及它是鑲嵌在何種特定的時空脈絡和社會關係下生成的。透過如此歷史結構和個人故事的交織探索，我嘗試想要理解，這些受訪者因爲什麼樣的價值、信仰和期待感到抱歉？而這些信念如何滲透進她們的生命，成爲她們組織和詮釋歉意的認知架構？研究的根本關懷在於指出，從訪談互動中建構出來的敘事，可以讓我們看到其所鑲嵌的社群傳統、文化意義和共享使命——即其所據以敘事的文化框架。對此文化框架進行反省，可以讓我們看到個人與社會的交

2 在本文使用的「故事」和「敘事」兩詞，除了在第一節分析敘事形式時所用的「故事」是指涉具有特定敘說風格和語法的形式之外，其餘皆指具有開始、中間、結尾，並以情節貫穿事件關連的一種論述形式，因而可相互通用。

織，並從中挖掘值得深化的議題。這樣的關懷回饋到女性主義的發展，將能活化女性主義的知識和實踐內容，並從中尋求改變的可能性。

## 二、從敘事研究看女性主義 的認同與實踐

### （一）在敘事中生活：認同、敘事與行動

敘事研究是一個多層次的研究展現形式。目前在台灣累積的相關研究中，有將敘事作為探索的對象，以討論特定敘事的性質、形成脈絡和在個人及集體生活中的作用（胡紹嘉 2005；柯惠鈴 2007；沈松喬 2009；范雲 2010）；也有將敘事作為探索的方法，將其視為理解和接近社會世界的手段（蕭阿勤 2003, 2005a, 2005b；邱天助 2007；楊秀宜 2008；蔡琰、臧國仁 2010；郭美芬 2011）；也有將敘事作為探索的產物，將研究的過程和結果以敘事的方式來呈現（蕭昭君 2004；胡紹嘉 2006；洪慧貞、洪志成 2009）。這些多層次的研究即便主題和視角各異，但都透過敘事處理個人與社會、結構與能動間的交錯作用；並將敘事視為一種再現，強調敘事並不是反映社會「真實」的中性文本，而是在特定歷史社會脈絡下，透過社會規範、權力關係、集體認同等力量而確立和再生產的結果。因此，這些研究之目的都不在展現實證性，而在於透過意義的建構與詮釋來得到脈絡化的理解。

將「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作為探究的對象，也是試圖透過個人和社會公共領域相互交錯的脈絡化過程，來詮釋個人的主觀女性主義認同如何透過敘事來展現。但這裡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是，為何敘事取徑適合用來捕捉女性主義認同說詞中的意義建構？針對此點，我們可以先從女性主義對何謂女性身分認同的長久討論談起。從十九世紀發展迄今，女性主義一開始關注的女性是根源於本質性的身分類屬，其主張由於女性經歷相同的被壓迫經驗，因而得以形成一個

女性共享的認同，而此本質性的女性認同也會共享一個獨特的觀點 (Flax 1983; Hartsock 1983; Rose 1983; Smith 1987)。不過，隨著語言學的轉向，此種認為女性是一個具有特定內在屬性的實體的觀點，逐漸在理論和實踐上受到挑戰。在理論上，此概念假設人類個體存在一種單一的、固定的、連貫的本質。但是，如同解構主義指出，物體的本質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透過「關係」而獲致意義；在關係之外，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知識主體。就如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1980: 400) 所言，女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位置並不是她的生理屬性的產物，而是她的行動透過具體社會互動和社會關係獲致意義的產物。因此，主張女性的身分能形成一個共同認同的觀點，忽略了女性身分是在社會關係中生成的，而不是進入社會關係的領域前就已然構成的性政治主體。

再者，在實踐面上，主張本質性女性認同的概念假設人類社會存在一種跨文化、普遍性的父權制，使得女性的壓迫經驗具有單一固定的形式。然而，後殖民女性主義已經發現，普遍性父權制的概念僅是一種迷思 (Kandiyoti 1991)，且女性所受到的性別壓迫並不能從政治、階級、種族、性傾向等權力關係的軸線中分離出來 (hooks 2000: 19; Mohanty 1991: 63)。因此，若我們仍堅持女性認同範疇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就是在拒絕具體建構女性樣貌的文化、社會、政治相互交織的多重性，並以一種批著普遍性本質的外衣、但實則從單一標準出發的政治性概念，來排除、評判、規範女性們的各種複雜社會現實 (Butler 1990: 6; Ong 1994: 376)。基於這兩種理論面和實踐面上的批判，女性主義逐漸放棄將女性視為固定的本質論，而將焦點轉向去討論這個看似自然固化的性別身分範疇，是在何種互動和權力關係之下建構出來 (Butler 1990: 7-8)，且在每次思考或說話的過程中持續不斷的重構 (Weedon 1987: 85)。由此，女性的身分認同便不再固著於本質的身分實體，而成爲在具體互動、論述和社會關係中持續生成的過程。而掌握這些過程中的微妙變化，便會是我們理解身分認同何以形成的機制。

那麼，我們該如何掌握這流動的認同和行動的形構過程，再現並理解這些動態變化？二十世紀末開始興起的敘事研究，在此便成爲一個切入的取徑。敘事是一種普遍的文本類型，一種將時間和連續事件組織起來的論述(Riessman 1990: 79)。由於敘說的衝動是一種天性(White 1980: 5)，因此，敘事的歷史是與人類的歷史一同開展，且是國際性、超越歷史和跨越文化的(Barthes 1977: 79)。不過，隨著敘事的轉向，<sup>3</sup> 敘事也重新被概念化，超越原本僅具有的情感表達、傳達思想和再現真實的工具性功能，而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獲得新的意義。就認識論而言，敘事開始被視爲是一種正當化的知識形式。例如，Jean-François Lyotard (1984: 26)將知識分爲科學知識和敘事知識，認爲這兩者存在的價值和標準不同，且各自有使其知識正當化的形式。同樣的，Bruner (1986: 11-14)從人類認知運作的方式著手，區分出兩種無法相互化約，且各自提供不同的組織經驗和建構事實的方式的思想模式：典範性模式(paradigmatic mode)（或邏輯—科學模式）和敘事模式(narrative mode)。前者通過範疇化或者概念化來形成一個體系，目的是爲了追尋一個普遍的、無涉時空的真實條件；而後者則是藉由將一系列的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透過追尋單一事件和其他事件的內在關係，來構成一個故事般的因果連結，以此來解釋人的意圖和行動。而在本體論的討論中，原本歐洲啓蒙思想中的自我是一個超驗的存在，人們思想的源頭就是來自於這個靈魂中心的絕對自我(Holstein and Gubrium 2000: 18-19)，而敘事在此的作用只是把這個既存的自我實體再現出來，就像一面鏡子般反射我們的所思所想。然而，事實上，自我不是一個靜態的事物(thing)或是一個實體(substance)，而是個別事件整合進歷史整體的一個架構；它除了包含一個人是什麼樣子之外，也包含他期待自己變成什麼樣子(Polkinghorne 1988: 150)。因此，自我是一個必須透過敘事來實踐的成就，在敘事建構中，自我被賦予內容、被描繪和被具體化(Bruner 1987:

---

3 亦稱修辭的轉向。相關討論可見 Baker (1990)、Brown (1990)、Nelson et al. (1987)。

13; Kerby 1991:1)。所以，敘事不該只是再現自我的工具，而是自我的本體論條件(Somers and Gibson 1994: 38)。

當我們體認到敘事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新意義時，它同時也指引一條方法論的道路，讓我們在放棄追尋一個女性身分的固定本質類屬，轉向去討論女性身分認同是如何被形塑且不斷再塑時，有了一個去捕捉此種認同過程的新方法。如同 Margaret R. Somers 與 Gloria D. Gibson (1994: 41)所言，唯有在認同的核心概念中注入時間、空間和關係性的面向，我們才能避免將認同和固定的本質類屬連結在一起。而敘事，正是一個同時體現這三個面向的方法，因為敘事是鑲嵌在時間和空間，並由因果性的情節賦予(emplotment)所建構的關係集叢。它不是藉由將事件放置在一個特定類屬來產生意義，而是透過將單一事件放置在和其他事件的時空關係中，並將部分連結至一個由符號、制度、物質實踐所組合而成的結構或社會網絡中，才得以辨別出事件的意義來(Somers and Gibson 1994: 59)。當我們藉由敘事將行動者鑲嵌在隨著時空而更改的關係和故事中，他的認同和行動就不再固著於穩定的身分類屬，而是隨著變化的時空及其組成的關係性敘事套組中形構出來(Somers and Gibson 1994: 65)。因此，「我是誰？」的答案就不是僅為主體賦予一個身分述詞（如「我是女性主義者」）；而是，每一天的答案都是在沿著時間面向及情節賦予所組成的事件敘說中，以「接著然後」(and then)的形式形構而成：我是誰，接著然後我計畫要成為什麼(Polkinghorne 1988: 152; Taylor 1989: 47)。

所以，我們可以說，人類的認同與行動都是存在於敘事之中。我們使用敘事結構來達成個人認同與自我概念，我們也透過敘事的詮釋表達形式來理解行動並為其賦予意義(Polkinghorne 1988: 145-150)。因此，說故事不只是揭露事實，它同時也藉由情節賦予的方式，將生命的片斷和個別事件組織起來，以讓我們理解過往行動的意義，期待未來計畫的結果，以及凝結自我概念的認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受訪者在訪談中所表達的「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歉意，除了在揭露實踐行動的窒礙難行之外，它更代表受訪者對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理

念的主觀建構。這個意思是說，爲了理解自己對女性主義的認同與實踐，受訪者會從生活中的影像、記憶和隨遇發生的事件，來建構讓自己和他人能夠理解的敘事。在此同時，她的價值、意識形態、理論信仰也會隨著她所選取的事件混雜進敘事的建構中，以情節化的方式來重新編排她所挑選的事件，並爲其賦予新意義。因此，閱讀她的敘事的同時，我們也閱讀了她對敘事的意識建構，以及背後據以支撐的理念。如同 Bruner (1986: 25) 所言，這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我們對事實的描述並不是通過一個全知之眼，而是透過故事主角的認知濾鏡。所以，受訪者的道歉說詞，並不是一個原始事實的呈現，而是她的認知濾鏡所組織出來的敘事。透過這些敘事，她企圖理解和評價自己的經驗，以建構出自己曾經是、現在是、未來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如果我們要更爲理解「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所傳達的意義，便要進入受訪者敘說時的認知濾鏡，查探映射於其中的價值、信仰和理念是如何架構她的敘事過程，使她將自己的行動詮釋爲一種深感不足後的歉疚。透過如此的閱讀方式，道歉敘事便不僅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因爲自我行動不符合固定本質的身分認同而衍生的反思結果，而是鑲嵌在特定時間、空間和關係脈絡中，並以蘊含特定價值理念的認知架構來爲事件賦予情節而凝結出的一種認同建構。

這麼說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人們並不是僅憑個人意志來創造敘事。敘事需要有說者和聽者，而說者和聽者若要彼此理解，就必須共享某些關於生命性質的深層結構。亦即，個人的生命敘事必須融合進一個生命敘事的社群中(Bruner 1987: 21)。這個社群所共享的背景知識和理所當然的假設形成一套「質樸知識」(native knowledge)；當個人的私人敘事體現了這套「質樸知識」時，它就會變得很自然、很易懂，並且宛若世界結構的一部份(Riessman 1990: 65)。因此，當我們理解受訪者在訪談中組織起來的敘事時，必須先回到它所坐落的社群脈絡，討論她在主體化敘事建構的過程中，是如何受到鑲嵌在其中的共享文化而影響，如此才能更爲細緻的詮釋受訪者的女性主義認同與

實踐敘事。

## （二）樹和那片森林：道歉敘事裡的歷史與文化

探討個人敘事與其所鑲嵌的社群網絡間的連結，就好比從森林的綠蔭細縫中，看見一棵樹和整片森林的關係。樹以特別的關係組合成森林，而個人透過和他者的關係和對話網絡以認知到自我的意義。「藉由去定義我從何處說話，諸如在家譜中，在社會空間中，在社會地位和職責的地理中，在我所愛的人的親密關係中，也在確立我最重要的關係的道德和精神傾向中，我定義了自己是誰」(Taylor 1989: 35)。因此，我們對自我認同的認知，是和我們所處的文化和歷史脈絡緊密相關的。如同 Charles Taylor (1989: 26)所言，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道德空間中，理解自己是誰，就是在道德空間中確認自己的定位。亦即，這個道德空間會賦予我們一個「無可逃避的框架」(inescapable frameworks)，來為我們的道德判斷、直覺或反應提供明顯或隱含的背景，讓我們去斷定什麼樣的生活形式是有價值的，我們的尊嚴該放置在何種特定的成就或地位上，以及運用何種方式來定義我們的道德義務。

敘事是使這個「無可逃避的框架」得以體現的一個重要方法。Bruner (1987: 15)曾說，要刻劃一個文化的重要方法，就是去看我們用以描繪生命歷程的敘事模式。由於文化透過寓言、傳奇、戲劇、小說等媒介提供了生活的各式範例，也提供了關於家庭、社群、社會和人類的故事(Richardson 1990: 127)，這些文化中盛行的經典生命敘事形成了一個基模資料庫(Natanson 1970: 22)，不但反映了特定文化中盛行的「可能的生活」會是如何的樣貌，更提供了一套普遍的情節輪廓(Polkinghorne 1988: 153)，讓我們據以建構自己的生命敘事。這些指引我們述說生命敘事的文化框架，最後會形成結構我們的認知經驗、組織我們的記憶、劃分且訂製我們生命中的「事件」的權力(Bruner 1987: 15)；一旦我們失去如此的框架，生命中的經驗將會變成一團混亂，而我們也將無法以身為人的感知來生存(Bruner 1990: 56)。

回到「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來看，此對話網絡是鑲嵌在女性主義的社群之中：說者和聽者都受過女性主義教育薰陶，且彼此都認知到敘說的內容將會是學術論文的材料。由於學術文本總是為了特定的讀者而書寫，且在有限近用的管道中流通(Nespor and Barber 1995: 51)。因此，這些說者所認知到的聽者，除了當下身為訪談者的我之外，使用她的敘事產製而成的學術論文將會觸及到的特定讀者——女性主義學術社群——也成為她預期的潛在聽眾。所以，這些道歉敘事是在台灣女性主義社群中長出來的。它除了反映說者個人的反思與自省，更重要的是，它還體現了一種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一種描繪了某種女性主義的價值、成就和道德義務的共享意義庫。換言之，這個框架告訴了這些在媒體職場的女性主義者應該欲求什麼樣的生活、嚮往什麼樣的成就、又應該擔起什麼樣的責任與道德義務。因此，她們會依循此框架來定義自我所處的情境，詮釋自己的經驗和行動，並為自我在社會世界中找到一個定位。

那麼，在這個道歉敘事中，說者和聽者共享的女性主義文化框架究竟是什麼？且這個文化框架中盛行的主流敘事範本和普通的情節輪廓又是什麼樣貌？綜觀受訪者在訪談中提及的經驗，其接觸女性主義的管道包括性別課程、校園社團、相關社會運動及活動、自行閱讀等。因此，我們可從這幾個面向來討論其所具有的環境氛圍。首先，鑑於性別研究在國際學術界逐漸受到重視，臺大、清大、婦女新知基金會、高醫、中研院從八〇年代中期陸續成立相關研究機構；而至九〇年代之後，各大專院校也陸續成立性別研究中心來推動相關的性別研究與活動。<sup>4</sup> 因此，在這些學術研究機構的著力之下，女性主義的論述開始走進大學校園，透過各式相關的課程和學程，讓許多學子開啓了性別的眼睛，看見不一樣的世界，並在此「看見」中，承擔起

---

4 包括 1994 年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籌備成立「女性文化研究室」，1995 年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成立「性別空間研究室」，中央大學英文系組成「性／別研究室」，及成功大學成立「婦女與兩性研究室」；1997 年則有世新大學成立「性別與傳播研究中心」；1999 年淡江大學成立「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東海大學也成立「性別與文化研究室」；2002 年暨南國際大學成立「性別議題研究室」等。

特定的道德價值和責任期待。而從各校性別研究中心或教學單位的成立宗旨來看，這些責任期待可約略分為學術面、教育面和實踐面等三個部分。在學術面上，它預期倡導女性主義觀點的研究及培育相關人才；<sup>5</sup>在教育面上，則希望提供思考的新觀點，來普及性別意識和提升性別平等的概念；<sup>6</sup>而在實踐面上，則期望將影響面擴及至整個社會，來督導、落實各項相關社會政策，<sup>7</sup>以提昇婦女福祉與權益，<sup>8</sup>進而推動性別平權之社會改造工程，<sup>9</sup>達成社會之體的公民教育。<sup>10</sup>由此可見，性別教育的宗旨裡蘊含著一種啓蒙的情節輪廓：在性別正義的價值關懷底下，透過教育啓蒙人們對性別的想像，達成普及性別意識和揚升女性主義的成就；最後，在持續實踐的過程中，將性別意識和平等概念遍地開花式的擴展於社會整體，改造社會成為性別正義的美善之地。如此的情節輪廓述說了性別教育中的價值、成就和道德義務。因此，在此宗旨期許之下，每個學子都被期待在女性主義的知識洗禮下，能夠喚起性別自覺；接著步出課堂和校園之後，更能進一步成為性別正義的尖兵或種子，為社會帶來一場改革翻覆。

除了在校園課堂中提供知識洗禮之外，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組織也在社會運動／活動的層面演示了性別改造工程的理念和決心。除了舉辦研討會、座談和演講來深化和傳播女性主義的論述，這些學術組織更從體制內外進行各式鬆動父權結構、激發性別意識的實踐行動。以主張「運動」與「學術」並進的女學會為例，自1993年成立以來，便以大學校園為基礎，將其觸角從教室延伸至街頭、媒體、立法院、行政院等相關機構（林芳玫2003:98），進行各項如軍護課程、校園性騷擾、女性參政權、照護工作、國家特考、性侵害、公娼政策等議題的改革行動。而這些在學界內外蓬勃旺盛的論述和實踐行動力，也感

---

5 請參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臺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等網頁資料。

6 請參見高醫大性別研究所、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等網頁資料。

7 請參見成功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室網頁資料。

8 請參見臺大婦女研究室網頁資料。

9 請參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網頁資料。

10 請參見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網頁資料。

染了大學校園中的許多女學生，不再只是單純接受啓蒙，更主動的從中培植而生的意識和力量化爲具體行動，紛紛於八〇年代末期至九〇年代初組織「女性主義研究社」，並建立跨校的「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在平日以讀書會、演講、座談、出刊物等方式培植性別意識，而當校園或社會發生性別事件時，更會展開跨校性的結盟或與婦女團體串連，來進行遊行抗議、連署請願等行動（謝小苓、陳佩英 2006: 12）。此外，1994 年華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女書店，在婦女新知和女學會的積極籌措下成立（蘇芊玲 2004: 77），以販售並出版「由女人所寫、爲女人所寫、寫關於女人」的書籍爲主，帶動了往後許多出版社出版女性主義相關的各種書籍（李元貞 2005: 16），爲婦運的文化面提供了豐富的滋養土壤；且其藉著籌劃各項活動，多方邀集相關人士來和讀者分享對話，對年輕學子起著重要的影響，也成爲婦運團體工作者的知識補給站（鄭美里、羅惠文 2005: 89）。

透過這些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和沉潛思辨的知識論述，原先展示在性別課程宗旨中的抽象精神和情節輪廓，具體化爲鑲嵌在特定時空且相互關連的種種事件，並以情節賦予的方式組合成故事的典範。如此一來，性別課程宗旨的期許不再只是紙上談兵，更確實的寫進自己的生命，成爲架構未來生活圖像的基模。如同彭滄雯(2006: 76-77)在回憶女廁運動對自我的影響時說到：「女廁運動啓蒙了我和許多女研社朋友的社會運動意識——每個人都有可能是進步改革的種子。」而此種從啓蒙自覺走向進步改革種子的自許，便成爲許多走過如斯過程的學子心中欲求的成就和道德義務。

再者，除了這些親自躬逢其盛的經驗給予年輕學子對女性主義文化框架的想像，歷史上婦運前輩的改革故事也同樣喚起如斯的精神和價值。由於女性主義的起源原本就是一種追求社會改革的政治運動，其政治目標爲發展出改變的策略以獲致真實的性別平等成果(Harding 1987b: 182)。因此，在教授女性主義的過程裡，在婦女運動中努力尋求改革的英雄／團體和前進者的故事也經常被傳散和頌揚。翻開台灣

的婦女運動史，雖然婦女運動的發展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而在運動策略上各有不同的取徑，但它們都顯現了此種「意識揚升帶來行動改革」的情節輪廓。沿著顧燕翎(1993)對台灣婦女運動所做的分期來看，台灣婦運的第一波可說是呂秀蓮在1970年代發起的「新女性主義」。她將新女性主義定調為一個「思想、信仰和力量」的啓蒙進程，希望藉由思想的啓示來激發女性對自我存在價值的追尋，而後形成一種眾人信奉的信仰，最終產生一股力量來實現男女平等（呂秀蓮 1990 [1974]: 150-153）。接著，1980年代後，李元貞結合了另幾位知識女性成立「婦女新知雜誌社」，提倡女性自覺的觀念，藉由喚起女性對自我情境的理解和覺察，來鼓勵婦女積極參與社會、發揮潛能（李元貞 1986: 5）。最後，1987年解嚴之後，許多新興的婦女團體相繼成立，開始採取走上街頭抗議（如1987年「反對販賣人口—關懷雛妓」街頭大遊行）、結合進步政治力量（如進步婦女聯盟）、對體制內的法律改革施壓（如台灣婦女救援會）、甚至直接進入政治體制內進行改革（如婦女新知將1989年明訂為「婦女政治年」）等強烈、突出的運動傾向，將婦女運動的目標從前階段的微觀和個人改變的「意識揚升」主張，進一步挺進到追求體制內改革的性別正義和女性賦權。

這些婦女運動前輩的故事，經過一再的講述，會被審議為女性主義革命過程的某種目標(end) (Cassell 1989: 150)，並為女性主義社群提供一個旨趣、刺激和情感的環境，讓其偏好某些特定圖像；此外，它也會提供一個持續的制度和風俗框架，以作為一個建構記憶的基模基礎(Bartlett 1932: 255)。所以，這些故事除了讓社群記憶婦女運動的奮鬥歷程之外，這個記憶的社會心理學過程也形成了女性主義社群的特定心理傾向和文化特質，決定其成員會在環境中觀察到什麼，以及如何從過去的生活來連結今日的行動反應。因此，這些為婦女運動奮鬥的前輩故事，不再只是與社群成員生命相隔遙遠的傳奇，而成為內在於生命故事中的一部份。這種內在性，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故事成為角色模範的基礎，讓社群成員在體認自我對女性進步的貢獻時，從中得到鼓舞的力量來激發行動(Jacobs 1989: xv)；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它讓

自己的生命故事與前人的故事交錯，凝結出一股歷史社群的共同天命。敘事並不只是個人的命運，而是一種介於當代間和前輩與後繼者間的溝通。透過將過去的可能性傳達給現在的聽眾，敘事開放了歷史經驗，並將其超越個人歷史的層次，轉變為公眾的歷史。所以，在故事不斷被敘說的過程中，人們會以一種重述要點的方式來經歷過往的歷史，歷史社群的共同天命因而就被重複和召回(Ricoeur 1981: 184-185)，成為人們共享的價值精神與責任義務，也成為指引人們架構自我故事的框架和情節輪廓。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歷史天命的召喚和道德責任的薰陶，形成了一個女性主義社群的共享意義庫，展演了女性主義的責任、使命和期待，也建構了一個描繪女性主義故事的普遍情節輪廓。簡言之，它形成了這些接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學子在建構自己的敘事時，所援引的「無可逃避的框架」。因此，將道歉敘事放回到它所坐落的社群脈絡，透過與其文化框架的交織閱讀，我們將更能理解道歉敘事是奠基在什麼樣的價值、信仰和期待之上，而這些信念又如何在她們組織和情節化事件的過程中顯現出來，使其定義自我的情境，詮釋自己的經驗，並為自我在社群位置中找到一個定位。

### （三）說者欲解決的問題：道歉敘事中的問題意識

框架決定了我們的敘事情節，而情節會為故事賦予方向性，讓先前的事件沿著此方向與後來的事件結合起來，以形成一個具有開始、中間和結尾、且首尾一貫的故事整體。而故事中的事件除了具有時間次序，同時也具有某種邏輯連貫性，此外還具備一個必要特徵，即必須破壞故事原初具有的平衡狀態，造成情境的反轉。因此，一旦故事要進展，便必然涉及到狀態反轉的緊張衝突(Franzosi 1998: 521)。如此的緊張衝突，可稱為是情節所蘊含的問題意識(*problématique*)，行動者必須透過敘事時間的過程來處理問題意識，以讓其中的緊張衝突獲得釋放和解決，才能使故事順利開展下去(Ringmar 1996: 72-73)。

而當敘說者透過情節賦予來組織生命中的女性主義認同和實踐經

驗時，其情節所蘊含的問題意識，在於敘說者想要達成女性主義的使命目標，但由於某些因素造成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因此必須採取行動來解決，以讓故事得到開展。爲了達成這樣的目的，敘說者在這個訪談脈絡中必須解決幾個問題。首先，由於我在研究中所界定的女性主義者身分是由受訪者的自覺認同來判斷。因此，爲了證明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受訪者需要讓過去不在場的聽者相信，她的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培養出女性主義思維。其次，當敘說者回顧生命中的實踐經驗，面臨橫跨在眼前的理想和現實間的鴻溝時，爲了讓聽者理解這道鴻溝是實存的，她要具體展示媒體職場的環境確實限制了女性主義實踐的空間與機會。最後，如前所述，在女性主義發展的脈絡中，從意識揚升到行動實踐的進程被認爲是可欲且光榮的狀態，因此敘說者也想要讓聽者理解，在這道巨大鴻溝跟前，自己的實踐策略即使不如理想中的想像，卻也是一個深刻反思下的行動選擇。

在考量這幾個問題之下，敘說者必須找到一個詮釋事件的方式，來讓自己和所描述的時光被理解，同時也透過將自己的生命故事凝結成一個連貫的整體而獲得自我理解。在此過程中，重要的是，我們並不能只關注敘事本身的內容，或考慮敘說者是否會刻意遺漏、誇大或捏造某些事件或情緒來正當化自己過往的作爲，以警覺故事的「真實」是否被模糊了。反之，一個關於生命的激動人心的故事，並不必然是一個「正確」(right)的故事(Bruner 1987: 14)，因爲所謂的「真實」判準總是具關係脈絡性的，我們並不能單憑敘事本身來判斷她的真實性，而應該去討論「什麼樣的說法才是有意義的」(Winch 1990 [1958]: 72)。這個意思是說，敘事的「真實」並不是根據一個固定的標準或規則而來，而是透過故事的似真性(verisimilitude)、彷彿事實(truth likeness)，或更精確的說，是透過故事的生動性(lifelikeness)來獲得詮釋。這種意義的詮釋是隱喻的、影射的、跟隨脈絡而變動的(Bruner 1990: 61)。所以，當我們要理解故事的意義時，便必須跟建構和傳遞故事的文化常規網絡相連結，辨別出這個更大脈絡的結構，才能詮釋出故事的意義(Bruner 1990: 64)。

因此，要讀出「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敘事的耐人尋味之處，並不是去關注她們所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實，而是要去討論她們如何在一個更大的脈絡底下詮釋事情。Ruth Behar (2003: 18) 在記錄一個墨西哥裔女性 Esperanza 的生命故事時有以下的描述，她跟 Esperanza 說她很喜歡聽她講故事時，Esperanza 大笑之餘問她是否聽過一個諺語：「告訴我一個故事，即使它是謊言」。Behar 認為，在這個笑語背後有一個更為嚴肅的心情，就是 Esperanza 常會懷疑美國人是否會相信她所說的生命故事。而造成這種憂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她所說的故事不真實，而是因為要瞭解她的生命故事需要同情和理解，而她懷疑美國人根本沒有能力、且不願意付出這些理解。由此我們看到，要理解一個故事並不是輕易之舉，而是要對說故事的人付出相當的努力，才能領略故事所欲傳達的意義。所以，要理解受訪者在訪談中為了自己對女性主義做得不夠多、不夠具有影響力所引發的自責和歉咎時，我們必須走進受訪者敘說時所處的文化框架，以這個更大的脈絡作為達成同情理解的資源，如此才能展開對這些經驗的理解，真正讀出這些道歉敘事構成的意義。

###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詮釋

#### (一) 研究方法與方法論

本文所分析的敘事資料來自我在 2004 年 2 月到 9 月間進行的深度訪談。訪談的對象共有 25 位媒體工作者，都在大學教育中接受過女性主義訓練，且自我認同為女性主義者或親近女性主義文化。<sup>11</sup> 訪談的主題涵蓋在校園中接觸女性主義的過程，以及在校園和職場裡實踐女性主義的經驗。隨著每次訪談情境的不同，訪談形式會游移在半

---

11 由於訪談的議題涉及到個人的觀點與境況，在研究中披露她／他們的言談可能會造成身分、職業和自我認知上的傷害。因此，在接觸潛在受訪者的過程中，我都會先讓受訪者審視訪談大綱，解釋訪談可能涉及的面向及議題；並在同意參與訪談之後，充分告知此次訪談的目的和訪談資料的學術運用原則；並在訪談結束後，共同確認訪談資料的適切性和披露的界線。

結構式和開放式之間，訪談時間也從一個半小時至四小時不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是透過個人網絡、師長友人介紹和滾雪球的方式來接觸潛在的訪談對象，基於此種人際網絡的有限性和同質性，最終參與訪談者的背景在人口學變項上（如性別、階級、年齡、居住地等）的分布較為同質。<sup>12</sup> 此種同質性的現象當然涉及到樣本代表性及隨之而來的推論概化力的問題。<sup>13</sup> 當參與訪談者都處於類似的社會位置，擁有相似的文化與社會資本，自然便會影響其敘說的能力和故事內容，進而影響本研究的詮釋和推論。因此，審視研究資料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下得到的，是研究者在避免產生研究的謬誤和盲點時，必須謹慎面對的反思性議題(Smith 1987: 92)。

而從此次的訪談脈絡來看，儘管受訪者在人口學背景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接觸女性主義的管道、所形塑出的女性主義認同、媒體職場的工作經驗等都各有不同。此種部分同質而部分異質的特性所引發的引人入勝之處便在於，為何當她／他們在女性主義的訓練和實踐道路上擁有相異的經驗時，卻仍都在訪談過程中吐露了相似的歉疚之意。此種一致的歉意必然與她／他們擁有同質的人口學背景相關，但同時也跟訪談脈絡的建構相關。正是因為這些參與訪談者因著類似的人口學背景而浸濡在特定的時空中，並與當下及預期的聽者建立起特定的關係，才會產製出此相似的道歉敘事。若要為此特定的時空與聽者社群命名，不可諱言的，我們可以直指其為九〇年代的北部都會中產階級菁英女性主義者。因此，此種道歉敘事所指涉的，並不是全稱式的女性主義者所共同面臨的處境，而是在此特定的歷史時空和特定人們的互動中建構而成的敘說實作。

然而，即便不是全稱式的、可概化類推的女性主義境況，此特定脈絡而生的道歉敘事仍有其意義。如同 Donna Haraway (1991: 187-188, 190-191)所言，女性主義並不需要一個許諾超越(transcendence)的客觀

12 在 25 位參與訪談的對象中，在性別變項上，有 22 位為女性，3 位為男性；年齡層的分布為 25 歲至 40 歲之間；在階級變項上皆屬中產階級，並受過高等教育的訓練，且皆居住於都會區。

13 關於此點，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性教義，也不需要一個失去知識定位和中介軌跡的故事。反之，她擁抱的是關於有限的所在(location)和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並認為唯有透過體現的客觀性(embodied objectivity)，才能對事物做出可靠的說明，及產出可定位的批判知識。所以，當我們定位在特定的時空和關係下來對此道歉敘事做出說明時，便是透過處境知識和部分觀點的客觀性，來描繪特定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和生活，並在此詮釋過程中達成一種可定位的知識實踐。

而在此種知識實踐的過程中，接續而來的問題是，研究者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來追尋一種客觀的可說明性。本研究的訪談過程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互對話形構而成的。因此，這是一種他者與自我知識相互影響的過程，我們無法從中抹除的，便是研究者的涉入和其身為「人」的身分所具有的主觀性。如同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 261)所言，我們在個人敘事中看到的真實，有時候會把我們從「詮釋者是外在於故事」的自滿安全感中拉出來，讓我們察覺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也在我們的詮釋裡扮演一部分的角色，並塑造我們從中得出的意義。此點對於主張「無污染研究」(hygienic research)的研究方法而言，是一種破壞研究客觀性的危險舉動。然而，女性主義一直致力於主張反身性的研究，抗拒將研究者視為一個隱形的、匿名的權威聲音，而認為研究者是一個擁有具體特殊利益和欲望的真實個體(Harding 1987a: 9)，其信念、行為、主觀性和特定的位置和認同都是經驗證據的一部分，會影響和形構出研究的核心意義，因而必須將其視為知識的主要基礎來加以審視(Smith 1987: 91; Blackwood 1995: 55)。所以，研究者的涉入不但不是必須革除的研究污染，反倒是構成研究結果的重要元素。

將上述的理念落實到研究的田野場域，意味著研究者在選定研究問題、挑選受訪對象、分析研究資料上，個人的社會位置和情感都微妙的包裹於其中，影響著資料蒐集與詮釋的過程。本研究問題的起源

---

14 關於此處實踐經驗的詳細討論，可見余貞諠(2005: 1-7)。

來自我在職場工作時的實踐受挫經驗所產生的困惑，<sup>14</sup>因而，當我進入田野時，我除了帶著中產階級女性主義者的社會身分，還對女性主義的認同與實踐懷抱特定的情感，在認同女性主義實踐行動的賦權力量之時，同時也關注何以無法揮展實踐行動的結構限制，及在此反挫力量下形成的心情反思。而我帶進田野的這些社會身分和情感，成為我與受訪者分享和交流的一部分，同時也影響我所蒐集到的資料內容。如同 Rabinow (1977: 5)所言，田野工作是一個由文化中介和位於歷史中的自我所執行的經驗性活動。因此，研究者在與受訪者互動時，並不是一個中性的存在，而是一個位於特定情境中的他者。若要理解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存在及其主觀性會帶來何種反應，就必須要知道研究者在田野場域中是如何被認知的(Blackwood 1995: 53-54)。審視本文田野的訪談關係，我的社會位置和經驗，使得我在訪談過程中兼具微妙的「姊妹」與「代理人」的雙重角色。在「姊妹」的身分上，我與受訪者共享相似的女性主義文化背景，也在職場實踐上經歷類似的觀察和反思，因此我們經常在訪談中分享彼此的實踐經驗，並透過相互敘說發展出一種姊妹情誼的互信與理解關係；但在「代理人」的身分上，由於學位論文需要經過口試審核，因而受訪者都深知其言論必定會受到相關師長的審視。所以對受訪者而言，我的現身同時意味著背後存在的預期聽者（即相關師長及運動者），因而受訪者常明確以這群預期聽者為對話對象來形構自我的敘說（如「老師聽到會哭吧」、「她們可能會很失望」）。在這雙重角色的影響下，受訪者一方面因信任而對具「姊妹」意義的我敘說，一方面也因意識到師長和相關運動者可能的評價而對具「代理人」意義的我敘說。因此，我的社會位置和情感所造成的敘說者和雙重敘說對象的複雜互動，便是衍生此次道歉敘事的關鍵；若抽離掉任何一環的研究者涉入，便無法創造出相同的敘事。

再者，面對這些敘事資料，我的分析與詮釋也從來不是中立的。相反的，我本身具有的情感、視角以及不可避免的帶進敘事閱讀中的相關知識，都會為敘事的閱讀塗上一層意識形態的色彩(Franzosi 1998:

532)。由於自己在實踐經驗上的挫折，我能體會實踐挫敗後個人必然經歷的心情掙扎。所以，這些情感的涉入首先讓我在詮釋的過程中看重實踐挫敗衍生的心情，進而察覺歉意的結構性，而將其與更大的社會脈絡連結起來。所以，與其說研究者的情感涉入會遮蔽詮釋的客觀性，倒不如說研究者的情感自始至終都是帶領研究前進的一種推進力。

然而，在肯定研究者涉入的必然與必要之同時，並不代表研究者的涉入能豁免於批判性的檢視。在理性知識的追尋過程中，解碼和轉碼、翻譯和批判全都是必要的(Haraway 1991: 196)。因此，研究者在自我涉入的過程中，不但要仔細審視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間知識及情感的連結(Behar 1996: 14)，更要保持對自我本身的客觀性，即自覺內心的衝突、恐懼、希望等可能會影響研究的觀察和詮釋的情感。<sup>15</sup> 換言之，認知到自我透過哪些濾鏡來理解研究主題，並對此保有如同 Pierre Bourdieu 等人(1991: 13-14, 41-48)所言的認識論上的警覺(epistemological vigilance)，是我身為研究者藉此一方面與被研究者產生連結，一方面又能持續進行批判與詮釋以取得客觀性的重要形式。

## （二）資料的詮釋

本文的資料來源為訪談互動過程中建構出來的敘事，即受訪者根據自我的認知和訪談脈絡來組織自我的生命經驗，並以情節化的方式來編排各個事件，使訪談內容形成具有開始、中間、結尾的論述形式。除了言說的內容之外，受訪者所使用的修辭手段（如特殊的語氣、停頓）和非詞彙性的表達（如笑、蹙眉等動作），都構成我稱之為敘事並加以分析詮釋的元素。在與 25 位受訪者訪談互動的過程中，我所蒐集到的敘事或隱或顯的都吐露了相似的歉意。然而，由於我的研究目的是透過敘事形式來探討道歉敘事是如何鑲嵌在特定的時空和關係脈絡下生成的，而敘事分析又是在追求能夠解釋什麼樣的過程導

---

15 這部分的相關反省與討論，可見余貞誼(2005: 35-72)。

致結果的故事(Becker 1992: 212)，因而需要對敘說文本進行細緻的詮釋和分析。如此一來，要在此篇文章中分別對 25 個道歉敘事進行完整的討論，便是一個雖令人嚮往，但囿於篇幅所限而不可行的嘗試，因而我勢必僅能呈現部分的敘事資料。由於敘事分析在探究意義如何透過話語來表達(Mishler 1986: 66)，而語言的意義又在理念（關於說者經驗的內容）、人際（訴說者彼此間的關係）、文本（文本如何在結構和語意上加以連結）功能間相互流轉(Riessman 1993: 21)。因此，若要掌握話語的意義，就必須同時對這三個層級的功能有所理解。在 25 個訪談資料中，由於我與艾瑪和小英有類似同門情誼的背景，與沛莉雖無任何強連帶的連結，但她對訪談性質相當認同，使得我與這三位受訪者的訪談皆達兩個小時以上，並在過程中達到某種程度的彼此理解。這使得我既能從中獲得較為細緻的說者經驗，也清楚認知到我與訴說者間的角色關係，同時也有較完整的脈絡來理解話語中的結構性質，因而能夠較為妥切的掌握其話語的意義。因此，以這三位受訪者的敘事資料作為本文分析和詮釋的素材，對於敘事分析的目的而言是較為適當的。

如此的篩選雖是權宜之計，但並不失分析的可能及意義。在整體資料中，這三個敘事並不屬異例，也不特別具代表性。而之所以可能將它們獨立出來分析，在於敘事研究中的個案是一種在研究過程中因應研究目的而創造出來的理論建構(Ragin 1992: 7-11)，個案的行動主體為故事本身，因而個案所構成的意義來自於故事的情結布署所獲得的事件詮釋，而非其所內含的變項推導出來的因果模型。因此，當敘事研究中的個案被獨立出來時，它本身的故事仍是一個首尾一貫的存在，而不會產生如脫離因果模型即喪失推論意義般的結果(Abbott 1992: 54-62)。再者，一個民族誌的好壞，取決於它是否能夠透過深描來清楚說明當地發生了什麼，讓其中的社會事件、行為、制度或過程成為可被人理解的情境。而如此的理解之所以有意義，並不在於運用它來建立抽象的規律性或越過個體進行概括，而是透過個案中提供的資料，來使理論概念具有可感覺的實在性，從而能具體的對它們進行思

考，並加以創造性和想像性的運用(Geertz 1973: 14-16, 23-26)。由此來看，雖然本文僅能呈現三個道歉敘事的詮釋，但仍具分析的效度，能讓我們透過對個案經驗的理解和啟發，思索此種道歉敘事背後更為廣泛的意義和觀看方式。

界定了分析素材的範圍之後，接續而來的問題是，由於敘事在再現一個人對生活經驗的描述、詮釋與回憶時，通常是很綿長的，且充滿離題的話語和評述。面對這些素材，認為我們可以「只呈現故事」而不採用系統性的化約方法，是過於天真的想法(Riessman 1993: 43)。因此，敘事研究必然會涉及到如何把一個敘說的對談轉換成文字的文本，並經過分割、裁剪、編輯等手法來呈現並加以詮釋。Behar (2003: 12)將此過程稱為說故事行動的殖民化，亦即敘說者的話語在轉換和編輯的過程中變成研究者的商品。不過，這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對敘說話語進行任何轉換或編輯，因為研究中對敘事所做的轉換是必須且具生產性的(Riessman 1993: 14)；而我們需要警覺的，便是在轉換的過程中該如何呈現敘說者從其認知濾鏡來組織敘事的主體化過程。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 (1993: 33)認為，要做到這一點的方法，不只是要注意敘說者選擇強調的主題內容，還包括如何把這些陳述組合在一起——也就是訴說的形式。換言之，一個人說了什麼，跟如何說，兩者之間是相互關連、支撐與強化的(Geertz 1988: 27; Riessman 1990: 74-75)。當一個人用一種線性時間的、編年史般的形式在講述生命故事，或是依著情節主題來重新編排事件間的關連與順序時，這些敘說形式的選擇都不是任意的，而是一種政治行動，必然和生命故事被敘說的目的有關，也和敘說者對生命的詮釋和意義有關(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 99, 102)。有鑑於此，在這篇文章中，我根據敘事風格和語法，在三個道歉敘事中區分出四種敘事形式，可望透過敘事形式與內容的相互關係，來掌握更多理解敘事的資源和工具：<sup>16</sup>

---

16 區分出這四種敘事形式，是根據研究分析的向度，從中整理出較常重複出現且具轉折性意義的部分，並不代表它們窮盡了所有訪談過程中使用的言說元素。

1. 紀要：以記錄要點的方式來摘要相同主題的事件。爲了回應特定的主題，敘說者會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根據自己對事件的理解和詮釋挑出適當的事件群予以摘要。所以，這是一種讓聽者快速理解自己所體驗的生命經歷的方式。不過由於述說的形式只是簡單扼要的交代，沒有情節來組織貫穿事件間的關係，因此會讓聽者從比較遙遠的距離來理解敘說者的生活。
2. 故事：以故事的形式來描繪及評價一個特定事件。爲了突出此事件對自己的意義和影響，敘說者會描摹事件的經過，並給予特定的評價。具象化的描繪過程能幫助聽者理解此事件對敘說者的獨特意義，讓聽者進入故事發生的當下時刻，與敘說者一起重新體驗那個事件。
3. 自詰：以自我詰問的形式來省思過去的行動。敘說者藉此披露她對此議題的思考深度與反省能力，同時也帶領聽者進入她內心深處的掙扎與焦慮，讓聽者更爲理解她一路上所經歷的自我懷疑有著什麼樣的複雜性和影響力。
4. 宣言：以肯定的語氣來闡述自我反思後得出的想法和信念。敘說者對於某些議題曾有疑惑和自詰，但經過自我反思後，得出一套說服自己的說詞。此種形式對敘說者而言是一種在訪談中沈澱的自我整理，除了披露自己的心路歷程，也藉此理解和評價自己的經驗，將自己的生命凝結成一個自我認同的整體。

這四種形式雖普遍存在於敘說者的敘事結構之中，但做此區分的用意不是要爲道歉敘事的結構找出通則，也不是嘗試找出敘事形式間的因果關係，而是藉此來討論敘事內容如何壓進不同的敘事形式，並從中表現出敘事的意義來。因此，分類的用意是要將敘事形式連結至意義，探查這些敘事形式的元素對敘說者建構敘事而言有何重要性 (Polanyi 1989: 2)。所以，敘事形式間的排列，訴說的是意義的連結網絡，即敘說者呈現何種情感和經驗是重要的一種詮釋過程。而透過此種形式和內容相互性的意義連結，我們能藉此觀看敘事內容是如何在不同的形式間組織而成，以解決敘說者在訪談中面臨的情節問題意

識，使自己得到被理解和理解自我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將她們的敘事放置在文化框架的脈絡裡，使這些個別的「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歉意，回到它所坐落的森林，探查它所體現的共享意義庫和情節輪廓如何在敘說的過程中現其蹤影，並在敘說的過程中再生產出來。透過此種見樹又見林的方式，個別說詞得以超越私人的意義建構，成為鑲嵌在結構中的文化產物；我們也將能在單純道歉的私人自省之外，讀出更多的意義啓示。

## 四、道歉敘事的分析與詮釋

### （一）艾瑪：「我是這麼消極的一個女性主義者」

艾瑪，28歲，未婚，在大學和研究所時期便接觸女性主義，畢業後曾在出版社擔任一年的編輯。訪談一開始，艾瑪以「紀要」的形式來描述女性主義理論如何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產生交錯的過程：(1)準備研究所考試時接觸到批判理論和女性主義；(2)理論與生命經驗產生對話：大四時有一個同學被男友暴力相待，使她開始察覺男女權力的不平等；(3)回溯原生家庭中傳統男尊女卑的現象來印證理論概念；(4)進研究所後修習女性主義的相關課程。這一系列的「紀要」是用時間和因果關係的結構來陳述自我的經驗，透過艾瑪的摘要描繪，聽者可以簡要的理解她接受女性主義啓蒙的過程。此後，爲了呈現女性主義帶給她的深刻感受，艾瑪從「紀要」的形式轉進一個「故事」——「洋娃娃事件」：

我覺得那時候因為女性主義有很多種嘛，然後，嗯(p)<sup>17</sup>所以女性主義者有很多不同的堅持。那像我在上某個老師的課的時候，因為，嗯(p)，我那時候就是擦指甲油啊，化妝啊幹

17 在引述訪談稿時，文中的 p 代表短的停頓，P 代表長的停頓。

嘛幹嘛，然後去做報告的時候，可能我的黑色指甲油就是露在外面。那我報告完回去的時候，老師就在課堂上說(p)，就是說芭比娃娃啦，從小玩洋娃娃，女生就浪費時間在外表或什麼的。所以我覺得從那時候開始，我也在想說其實女性主義提倡多元啦，……那我就會發現說，欸，不同的流派其實自己就會採取不同的立場來批判，我就發現女性主義不是我全然服膺的東西，而是更幫助我去理解這個世界。（訪談記錄 F05）

透過這個「故事」，艾瑪巧手一揮的呈現出當時的場景，讓我們體會到她在當下所感受到的衝擊與困惑。但即使她認為自己並不全然服膺這複數的女性主義，這個從女性主義的特定立場上衍生的「洋娃娃事件」，卻仍在她選定自己的理想跟堅持時，成為一個隱然的對話對象。為了更清楚的描繪這種隱然對話所帶來的張力，艾瑪從「故事」的語法轉進「自詰」形式，透過「自詰」中的不斷疑問，深刻的呈現她身處其中的焦慮：

我很困擾耶，我覺得我一天到晚，就像妳後來有一個問題是說到實踐對不對？其實我覺得我的實踐上最大的阻力常常就是我本身受到的社會規範的限制或者是什麼，我覺得就像化不化妝這一點啊，對我而言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困境，……特別是因為我黑眼圈很嚴重或是什麼。……我自己又每天在那邊天人交戰，我在違背我的意識，那我不應該用這個來建立我的認同……。我常常要在這個上面 debate。（訪談記錄 F05）

從「故事」和「自詰」的對照中，艾瑪的敘事逐步讓我們進入她的認同世界，看見她和女性主義的融合和辯論的過程。最後，要為自我的女性主義認同立下評價和定位時，她則以「宣言」的形式說到其

信仰「尊重差異，然後可能要多培養不同的、多元的思考角度」。透過這些敘事形式的轉換，艾瑪帶領聽者由淺至深、由遠至近的遊歷她的女性主義認同世界，表露她對女性主義的涉獵深度，儘管這之中有困惑和焦慮，但也有她自我反思後凝結出的信念和自我定位。因此，這解決了她在敘事情境中面對的第一個問題：讓聽者相信自己具有女性主義思維。

接下來，訪談進入到關於女性主義的實踐行動時，我請艾瑪先談談在學校中的經驗，她一笑帶過，只用一兩句話說明自己在學校裡並沒有碰過實踐上的挫折與阻礙，接著指出「我大部分的挫折都來自工作」後，便自行將話題帶進媒體職場的經驗，以「紀要」的形式敘說她在職場上遭遇的挫折：(1)專業年長男作者在與她的合作中顯示對年輕女編輯的輕視與不信任；(2)女主管無法拿捏家庭與工作間的平衡，強化了同事們認為女性不適合擔任主管的性別刻板印象；(3)女同事利用女性特質來取巧或獲得他人的協助，強化了女性不適合公領域的刻板印象；(4)公司文化要求她在工作時強調嬌柔的女性氣質和打扮。艾瑪以一種船過水無痕的輕描淡寫來突顯校園經驗中的平順，再以一種四面埋伏式的多點併陳來描繪職場中的挫折力量，這種強烈的對比，讓聽者理解了媒體職場的環境對女性主義實踐的限制。

敘事說到這邊，艾瑪證實了自己具有女性主義思維，也顯示了媒體職場對女性主義實踐的不友善。然而，特別的是，艾瑪所敘說的實踐挫折不僅是作用於個人身上的壓迫，還包含了大環境中的性別刻板印象。這樣的敘說並不純是個人認知的結果，同時也顯現了女性主義教育的論述期待。由前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女性主義教育有一種「性別種子」的實踐期待，希望接受女性主義教育的學子出了校園能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如此的期待寫進指引艾瑪敘說生命故事的文化框架，使她所認知到的挫折力量並不只是她的行動本身是否達成抵抗作用，更包括整個大環境對女性主義的反挫力量（即那些隨處可見的性別刻板印象），都成為她必須一肩扛起、努力克服的道德責任。因此，一旦這種擔當改革大使的期待無法順利達成，艾瑪自然而然就

將其詮釋為自己實踐的挫折了。

站在艾瑪所描繪的挫折跟前，我感受到了一種螳臂擋車的驚險。結構如此巨大，個人如此渺小，這是多麼艱鉅的一種使命感。站在這堵高牆前面，艾瑪接下來要面臨的敘事問題，就是讓聽者理解她以何種行動策略來攀越這堵高牆。然而，艾瑪這時卻以一種自嘲語氣說：「像我是這麼消極[笑]的一個女性主義者，那時候是採取一種逃避的態度，就是好吧，我不要去作這麼多的衝突。」這句話宛若舉白旗投降般的告訴大家，這堵高牆她不爬了。這個自嘲態度似乎就要成為整個敘事的終點：因為艾瑪消極，所以她在實踐的過程中選擇逃避，無怪乎她對女性主義感到歉疚。可是，如果這個敘事這麼直白的結束，其中更為深刻的意涵也會就此消失。當我因為「消極的女性主義者」這句話太過擲地有聲，而再度追問消極的意思時，艾瑪先以「宣言」的形式描繪了她想像中的積極形象：

嗯，我自己的想像裡，是覺得就是不是那麼輕易妥協，……我覺得智慧很重要，我覺得就是在嘗試挑戰權威的同時，妳又可以不把整個事情搞糟，氣氛弄僵，或是把 case over 掉或是什麼之類的。對，這是很理想中的狀況，可是我不曉得說真正這麼做的人，她是不是其實還是妥協了些什麼？但是我覺得至少我常常連嘗試都沒有嘗試，就覺得對方沒有救，我就放棄了。對，但是我覺得事實上真正很積極的人不應該這樣子。（訪談記錄 F05）

艾瑪想像中的積極女性主義者的形象，是根據「我的生活經驗，還有包括我生活周遭看到的東西，我讀到的東西，融合出來的想法」。進一步詢問她在生活經驗中看到的細節時，艾瑪以出國唸書時遇到的英國同學和自己的對比作為例子，來說明她心目中的積極與消極形象。她觀察到一些在女性權益相關的基金會工作的英國同學，由於工作性質的緣故，「常常去挑戰，或是去 question 說，欸，這個情

況有什麼問題，應該要有什麼不同的想法，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因而她認為女性主義之於這些同學，似乎是一種「利器」、「力量」。然而，對比起自己的狀況，她卻時常覺得女性主義是一種讓自己感到心虛的監督力量。爲了說明這種心虛，她以兩個「故事」說明自己「在女性主義實踐上的最大敗筆」：一個是男友經常在家務分工和性別相處上挑戰她的女性主義思維，一個是父親干預她在工作和學業上從事和女性主義相關的選擇。在這兩個故事之中，「洋娃娃事件」的訓示和期待隱然成爲她建構敘事時的情節輪廓，讓她不斷在「當一個取悅別人的洋娃娃」和堅持自己的理想間的拉鋸中自我質疑。爲了顯示這種自省的掙扎與困境，艾瑪轉而以「自詰」形式來說明爲何這些「挫敗」會成爲她往「理想女性主義」邁進的阻礙：

嗯(P)，好吧，比方說，像我痛恨做任何家務事。可是呢，我也知道我男朋友肖想吃一頓飯很久了，所以我可能有一天心血來潮如果想要讓他覺得開心的話，我就會跑去下廚。可是在這個過程，有的人可能覺得這不算什麼，這畢竟是妳自願性選擇或是什麼之類的，可是我可能會覺得說我為什麼要爲了取悅他而去做一件其實我自己並不是很愛做的事情？……然後另外就是，嗯(p)，比方說今天如果我要去逛街或者是幹嘛，我就是不能夠，我就是情不自禁地就要去打扮，……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說，其實我照理講應該是覺得無處而不自得，我理想中的女性主義者就是很有自信，然後無論到哪裡都會覺得我不是很 care 別人的眼光，這一點我很努力在做，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我偶爾還是會受限於別人的眼光，因而去做什麼，對啊。（訪談記錄 F05）

從上述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發現，艾瑪以「紀要」形式闡述的實踐挫折都來自於公領域，但以「故事」和「自詰」形式闡述的挫折皆來自於個人生活和親友相處的私領域。這乍看之下似乎是奇怪的斷

裂，但仔細審視艾瑪的敘事，卻可以發現對艾瑪而言，私領域的實踐行動一直是公領域的前哨戰，「當我今天想批評一個東西或幹嘛的時候，我常常就會先想說，唉，可是我自己到底有沒有這個資格？或者是說其實我這樣子要求別人的時候，我同時是不是都有做到這些事情？」由此，我們看到個人接受女性主義啓蒙的不同過程會影響她所採取的實踐舉動，艾瑪從「洋娃娃事件」以來的慣於自省，讓她在實踐的跟前總反身性的看顧自己而對接續的行動產生猶疑，因此在評價自己的實踐作為時便自稱消極。然而，「消極」的標籤並不是艾瑪偶然的自我創造，而是 Charles Taylor (1989: 26) 所談的無可逃避的框架的影響。如前所述，在女性主義的社群中，無論是共享的文化框架或流傳偏好的集體記憶，都是一種任重而道遠的姿態，並且多集中在公領域的實踐作為。如此的圖像顯現在艾瑪的敘事中，便成爲一股指引她認知和詮釋何爲積極形象的框架。而此框架具有的權力，就是如 Behar (2003: 297) 所言，排擠了自我對女性主義是什麼的定義權力，而以此特定女性主義標舉的知識和實踐作為定義的權威來源，使得非屬此種版本的「積極」行動，都被歸於「消極」的標籤之下。因而艾瑪會認爲符合此文化框架的英國同學是積極的，而逸離此條軌道、總是在私領域掙扎自省卻還未付諸行動的她，對比之下顯得消極而心虛了。

再者，艾瑪的話語中還有另一個耐人尋味之處，她在談及積極形象的「宣言」中提到了：「我不曉得她是不是其實還是妥協了些什麼」。這個「不曉得」本身代表一種閱聽經驗的缺無，意即在女性主義社群流傳的經典故事，很少提及在女性主義的實踐過程中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妥協與讓步。這並不是說女性主義社群都不談實踐中的妥協，而應該說其談的是有限場域裡的妥協，特別是發生在公領域的改革行動上的迂迴實踐策略。例如，女性主義社群會談論呂秀蓮在追求經濟發展的七〇年代，妥協式的打出「善用女才」的口號，強調解放女性將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以爲新女性主義在社會空間中尋得生存空間（張毓芬 1998: 100, 206）；或是談婦女新知爲了避免社會排斥

及黨國打壓，而以數種避免強調女性意識的迂迴方式來間接推廣女性意識、累積婦運資源、並讓敏感的議題獲得合法化（范碧玲 1990: 68；張輝潭 1995: 51-52；顧燕翎 1996: 162）；也有如臺大婦女研究室在創立初期以低姿態棲身於人口研究中心之下，在控制生育率的國家保守立場之旗幟下，小心翼翼、不帶威脅的發展婦女研究的妥協故事（陳佩英 2004: 52）。這些故事都強調妥協是一種向情境協商後的策略，雖有些許缺憾，但仍是一種達成目標的靈活手段。然而，除卻這些工具性的妥協劇碼，如果妥協發生在日常生活的互動、在親密關係的相處、在親情責任的承擔上、在更為私密且難以安撫的自我辯詰上，它可以有什麼樣的面貌？<sup>18</sup> 如果妥協只帶來令人扼腕的退讓或失敗，如果妥協讓自我感到不滿和不安，如果妥協變成違背自我意識的責難，那麼這些妥協又該如何面對和解決？當這些妥協故事在女性主義的故事範本中幾近缺席時，我們自然難以豐富對妥協的更多想像，因而更加強化「積極」行動的單一面貌了。

從艾瑪呈現的敘事中，她敘說了一個洋娃娃事件的「故事」來傳達她對女性主義多元立場的偏好，而「故事」中的衝突情節也帶出她在這個偏好上所引發的自我反省。不過，即便經歷如此的自省焦慮，最後她以強調尊重差異的「宣言」形式作結，傳達了在自我懷疑和辯詰的過程中，她仍肯定自己具有的女性主義認同。而在實踐女性主義的部分，艾瑪先以「宣言」形式描繪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主義形象，並以此為對照標準，接續以「故事」和「自詰」相互映照的形式來反省自己的作為。透過這種方式，艾瑪讓聽者和自己理解了，雖然她並未達到心目中的理想，但她仍在實踐女性主義的道路上持續摸索，反覆

---

18 這部份的故事在婦運大敘事中全數缺席，但感謝審查人的提醒，我們可在一些婦運人士的個人書寫中略見蹤跡。如蘇芊玲在《不再模範的母親》和《我的母職實踐》兩書中，有討論到在自己的家庭和育兒經驗中，自許為女性主義者的身分如何「在傳統和自我之間進退折衝」（蘇芊玲 1998: 38）。由於兩書寫作的目的在於喚起社會對「模範母職」的反省，進而達成性別平等的願景，因而書中大部分是論述批判的文字，對於自己如何經歷折衝的細節，反而沒有太多著墨。王瑞香(1997)在《一個女人的感觸》中也曾反省自己的婚姻經驗，但大多採取隱喻式的描繪（如在婚姻中求全就像「拔取那一撮不必要的虎毛」(p.34)），而沒有提及在此經驗中如何與自我的女性主義意識對話的過程。

自省。藉此，艾瑪在敘事過程中達成了首尾一貫的連結性，將自我詮釋成曾經、現在和未來都會持續堅持女性主義的人。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艾瑪的敘事中，我們看見女性主義在校園教育中期待每個人成爲性別正義種子的論述期待，形構了艾瑪建構敘事的文化框架。這個文化框架指引艾瑪去認知何爲實踐經驗中的阻力和挫敗，使她將作用在自己身上的阻力和社會環境中的不友善都視爲實踐的挫折；而女性主義社群流傳的故事典範又讓她以某種特定形象作爲積極實踐的理想標準，並因爲自己相對照下的無法達成，而自稱消極，備感歉疚。由此可知，艾瑪對女性主義的道歉，並不只是一種純粹的自省，而是鑲嵌在整體社會脈絡的文化框架中。因此，如果我們要更同情理解艾瑪的道歉，我們要問的是，在這樣的文化框架中，女性主義的實踐故事是不是說得不夠多？當其專注於傳頌公領域革命抗爭的故事時，是不是忽略了還有許多不同的實踐可能在各個場域揚聲？<sup>19</sup> 一旦這些公領域之外的多元實踐可能和故事典範都不被看見和聽聞，社群成員不但會以爲實踐的目標只有單一圖像，因而無法想像在公領域以外的場域中，存有什麼樣的理想、模範和可能的生活圖像；更會因爲想像範本的單一化，而縮減了實踐改革的努力標尺，只以單一標準的「積極」定義做爲瞻仰和追求的目標。如此一來，女性主義將無法在社會各地進行一場全面顛覆的革命行動。畢竟，如同Liz Stanley 與 Sue Wise (1993: 166)所言：「我們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就跳進解放的世界，而是必須從日常生活中的許多小解放開始著手，否則『革命』永遠無法開啓。」而累積更多多元場域的實踐故事，讓整個社群具有更爲豐富複雜的行動想像，事實上就是開啓「革命」的一個小解放！

---

19 我強調要追求累積公領域外的實踐故事，並不是指台灣的女性主義和婦女運動都只關注公領域的議題。事實上，台灣婦運從八〇年代開始即關注婚姻和親密關係的議題，九〇年代更擴展至身體、情慾、性解放等私領域的範疇。然而，這種擴展指涉的是議題範圍的擴大，而不是實踐場域的延展。換言之，儘管我們關注私領域的議題，但其實踐操作化的方式仍是訴諸公領域來引起大眾的反省，而非發生在私人生活中的諸多小解放。

## （二）小英：「我真是愧對於學習這個知識」

小英，女性，31歲，訪談數天後便進入已婚身分。她在大學時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的議題，研究所畢業後進入報社擔任記者。訪談一開始，小英順著時間次序以「紀要」的方式陳述她的啓蒙過程：(1)大學好友是女研社的，連帶讓她開始接觸女性主義；(2)個人爭取門禁自由的家庭經驗觸發她反思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待；(3)研究所修習女性主義相關課程；(4)參加女書店舉辦的座談會、並從中尋找有興趣的書籍來閱讀；(5)以女性主義的關懷出發寫碩士論文。透過「紀要」的方式，小英引導聽者站在一個較遠的距離來觀看她的成長經驗，讓我大致看到她的啓蒙輪廓。接著，在這段以時間先後次序為組織結構的敘事後，小英察覺自己在時間次序上遺漏了一個重要的經驗，爲了突顯這個經驗對她的重大意義，她轉而用一種「故事」的形式，來表達她的生活經驗如何觸發她對女性主義的興趣：

我會對這個知識領域感到興趣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高中的時候的確有一段時間是特別喜歡女性的。……然後在日記裡面這樣寫啊寫寫寫，然後也有被我爸媽看到。……那那時候他們好像是覺得我怎麼跟那個女生走這麼近？喔，我會在日記上寫很多很難過的話啊，什麼因為那個女生又去跟另外一個女生好啊，然後不理我啊什麼什麼的那種的。……我覺得這個經驗我後來回想起來就覺得滿特別的。……因為那時候純粹就是很感情層面的，沒有很 *literarily* 的去想說這個問題這樣子。（訪談記錄 F13）

透過這兩段「紀要」和「故事」，小英一方面讓我瀏覽她接觸女性主義的歷程，一方面也細膩的以近距離的方式讓我體驗她的特殊生命經驗如何引發她從純粹感情層面走向知識學術的思考。在讓聽者有了這些體會之後，小英以「宣言」的形式來評價女性主義對自我生命的意義：

我覺得它對我最大的影響應該是讓我生活比較有自信吧，比較自在。……總體來講，就是說我覺得讓我對自己會比較有自信，而且就是你做什麼事情就是，嗯，你要說自私也可以[笑]，但是就是比較會以我本人為中心啦，那一些社會上的束縛我覺得我就不會那麼 care，活得比較快樂吧。（訪談記錄 F13）

從生命經驗一路走向自我反思後的信念，小英透過各種敘事形式的交互運用，成功的讓聽者相信她的確深具女性主義的思維與關懷。接著，訪談進入到實踐女性主義的經驗時，在校園生活的這一塊，小英先以「紀要」的形式說明周遭的親友都能理解她「是這樣的一個人」，因而會尊重她基於女性主義的關懷所提出的批判。接著，訪談推進到討論職場上的實踐經驗時，小英首先以「紀要」形式來談論她在職場上遇到的狀況：(1)採訪時會被男性受訪者毛手毛腳；(2)有一些男性受訪者特別注意女記者的性徵，造成女記者工作時的不舒適感；(3)跑新聞會遇到應酬的場合，而應酬中的男性文化和肢體碰觸都對女記者不友善。這一段「紀要」跟隨在小英談論校園生活實踐經驗的「紀要」之後，明顯產生了一股強烈的對比，讓聽者察覺小英已進入一個不同的場域；而這個場域比起之前校園中的尊重和理解，是對女性主義相對不友善的空間。因此，小英讓聽者確實感受到，職場環境對於女性主義的限制是遠比學校環境的自由解放來得嚴密許多。

而在細數了職場環境的限制之後，小英在訪談中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就是讓聽者了解當她面臨女性主義認同在職場上遭遇阻礙時，是採取什麼樣的實踐行動來自處和自我理解。在這個部分，小英繼續用一段「紀要」講述自己在職場環境的因應方式：(1)圓滑的化解（如順勢躲開、保持較遠的身體距離）；(2)與其他記者通報哪些特定人士會有肢體上的騷擾，以塑造一種敵意的環境作為制裁。這段「紀要」烘托出一種柔軟身段的攻防氛圍，其中所有的衝突都以一種婉轉的方式拆卸。為了帶領讀者更進一步的貼近她採取這些實踐策略的心態，小

英轉而以「自詰」形式說出一段省思：

坦白講，就抗爭的手段，就我來講可能某些人會覺得我很退縮啊，遇到這種事應該要跟人家講清楚，跟對方抗爭啊。可是因為我畢竟為了工作上的順利，我還是採取一種比較妥協式、比較消極的抗議，而不是說積極的去跟他講你為什麼要這樣子。這樣老師們會不會很失望啊？教了半天怎麼還是這樣[笑]！（訪談記錄 F13）

小英雖然自陳女性主義讓她不那麼在意社會規範，可是，她卻隱然察覺到女性主義對於「應該要怎麼做」有一個典範存在，而與這個典範的理想相比，她的作為相對消極而退縮。從小英的敘事來看，這個想像中的典範是來自女性主義社群的文化框架。如前所述，九〇年代學院內外的實踐活動，都流洩著一股轟轟烈烈、積極挑戰的抵抗精神。在這樣的故事典範和敘事情節之下，此種直截挑戰的精神被認為是可欲且深受鼓勵及期待的行動。因此，當小英進入職場，開始因「進入另一套社會規範」的緣故，而捨棄直接衝撞的策略，改採「妥協式」或「幽默」的方式來行動時，卻因為行動策略改弦易轍而衍生自己過於退縮和消極的不安。小英在以「自詰」形式引導聽者進入她的內心反思、體會她所經歷的詰問和疑惑之後，為了表達她對此議題的深刻反省，轉而以「宣言」形式來解釋這兩種不同實踐策略的成因：

我覺得是場域的問題耶。因為我覺得大學或是校園它就比較去鼓勵這樣一個批判的聲音。可是當你在一個團體裡面工作的時候啊，就變成說那種人際網絡突然就變得也滿重要的，所以你可能刻意去降低一些衝突。而且職場裡頭的那種不成文的規範，似乎就會期待你說以一種比較圓滑的手法去處理事情。它反而是變成一種，欸，今天你看一個人，這個人

他的職場工作表現怎麼樣，可能他如何去處理一些潛在的衝突，他如何以比較平順的方式去處理，也會變成外界對他的­一個正面的評價這樣子，它並不是去鼓勵一種很衝撞很抗爭的文化。（訪談記錄 F13）

透過場域的比較，小英點出了校園和職場中存在著不一樣的行動標準和典範。因此，以校園裡慣用的標準來看待職場上的行動策略時，被職場環境稱允的圓滑和平順，就瞬間變成「消極」和「妥協」了。而從這個「消極」和「妥協」的註解，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主義文化框架中鼓勵的實踐性格滲透進她的生命經驗，為她的道德判斷提供一個認知和詮釋的背景，因此她便自然的以校園中的範例和標準來衡量自己在職場中的表現，並拿文化框架中既定的工具去評價它的消極與否，因而衍生了自我懷疑與反思論述。

檢視小英的敘事，在訪談的前大半段，除了短暫穿插的「故事」和「宣言」，她幾乎都採用「紀要」的形式來敘說，這與小英接受訪談前的憂慮相關。在敲定訪談前，小英曾擔心自己缺乏豐富的實踐故事。在這層考量下，為了適當回應我的訪談題旨，在正式訪談時，小英總保持一定的距離來審視自己的經驗，因而摘要式的「紀要」最能符合她的需求。不過，當訪談進行過半，小英逐漸放鬆心情，並隨著議題的轉換而在訪談途中出現思考、停頓的現象時，為了捕捉內心的焦慮與反省，小英轉而以「自詰」形式帶領聽者與她一同遊歷內心的騷動。如此的騷動打亂了她既有的自我認知，因此，為了重新將自我凝結成一個整體，小英最後透過「宣言」形式來讓聽者理解她具有的反省能力，同時也藉此撫平自己在訪談中經歷的內心騷動，重新理解和評價自我的經驗，重回「活得很愉快」的認同之中。

另一方面，將小英的敘事放回女性主義的社群中，我們同樣看到了台灣女性主義社群的文化框架如何影響她的敘事，使得她在衡量自己在職場上的實踐作為時，自然而然的以在校園中薰陶出的標準和規範作為比較的目標，因而衍生出「我真是愧對於學習這個知識」的歉

疚。若要更為細緻的閱讀她的歉意，我們必須回過頭探看，當這些社群成員在校園中接受女性主義教育時，不論是課堂上的期待訓示，或是社群間流傳的故事典範，都是鼓勵她們勇於對抗、衝撞和改革體制的故事。因此，當她們帶著此種期待步出校園，渴望成為性別改革的種子時，身上所具備的工具箱也是因應上述期待所含納的。那麼，一旦她們遠離校園中的單純與解放，進入更為多元的環境與制度時，如此偏向單向度的工具箱似乎就捉襟見肘，因而讓無法用此工具使上力的女性主義者開始懷疑，自己的實踐行動是否不合理想，進而衍生愧對女性主義知識的歉疚。所以，將小英的敘事與女性主義的社群文化相互映照，我們可以進一步省思，若女性主義社群能壯大、擴充和異質化其所流傳的工具箱，讓行動者能因應複雜的環境而有更多工具的選擇，那麼，行動者在實踐的道路上就能減少因無力感而衍生的歉疚，同時也不再只能用幾種特定的工具來衡量自己的實踐策略，因而排擠了其他實踐行動的創意可能性。

### （三）沛莉：「自己真的不夠稱為是一個女性主義的運動者」

沛莉，33歲，已婚。在大學時開始接觸女性主義，畢業後任職新聞媒體界達三年的時間。與沛莉的訪談是以閒聊開啓的，因而一路都採取開放式的訪談形式。首先，沛莉談論了她觀看美國改造節目的經驗，並以「故事」的形式描述螢光幕上演的從體型、衣著和容貌進行改造的劇情；<sup>20</sup> 接著再以「紀要」形式談論她所屬的雜誌社如何以美貌作為賣點訴求。透過這兩段相互印照的敘事，沛莉帶領聽者從她的眼睛來觀看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中的美貌標準，並讓聽者體會她的女性主義觀點的批判能力；緊接著，她再以「宣言」形式來詮釋女性主義對自己的意義在於「訓練對於多元文化的一種尊重跟想像」。透過這

---

20 這些節目的進行方式是邀請想要改造自己（或親友）的體型、穿著或容貌的觀眾報名。製造單位從中挑出改造的對象後，便會介入改造者的生活，為其延請專業的造型師、運動教練等幫助進行改造行動。節目的進行經常以說故事的形式來告訴觀眾，進行改造的主角以往的生活有多悲慘，而改造行動如何讓她得到美麗的人生。

些敘事形式的轉換，沛莉自然而然的讓聽者理解她的確具備女性主義的思維和關懷。接著，沛莉以一個研究生因碩士論文計畫進入酒店從事田野調查，卻被媒體曲解為「下海扮公主」的過程作為引子，將訪談導入女性主義的實踐經驗，並透過「故事」形式來帶出她本身的實踐經驗：

發生的時候我剛好在她辦公室，所以我剛好可以看到她的那種反應。你知道嗎？就是很震驚啊，就覺得怎麼會被寫成這個樣子？……然後她就很害怕，……「怎麼辦啊，這樣我怎麼出去見人！爸爸媽媽會不會受到困擾？」之類的。然後同一個時間，我後來就在記者休息室，我就親眼看到媒體記者的反應，男記者的反應，他們的反應就是看到那個頭版有拍她的照片嘛，「啊，這種也可以去當小姐？這麼醜！」……，「那麼老，怎麼可能啊？我看她去當媽媽桑還差不多，還當小姐啊？」反正就是虧得很難聽。……我就聽到那種講法，我就覺得很刺耳。然後回到辦公室討論的時候，我就說我要報這個題目。……我就說我親眼看到這個女生她的震驚啊，然後這個媒體的操作啊怎麼樣怎麼樣，反正就講得很女性主義這樣……。後來要跟採訪主任報題目，我就這樣氣呼呼的去報，反正就講得很義正詞嚴那樣子。那那個採訪主任是男的，然後他就這樣[頭微抬，略驚的表情]：「好啊，妳可以報。」……。那我就覺得我在那個環境我是可以很自在地去跟人家討論這種東西，因為很多人覺得這根本不是一個題目啊，這種事情常發生啊，可是我就會去捍衛這種東西。（訪談記錄 F16）

沛莉所說的可以自在討論的環境，指的是一個自許為文人知識分子、組織扁平化、較無權威感的組織氛圍。在那樣的環境裡頭，她除了能夠理直氣壯的捍衛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女性主義帶給她的觀點

滋養和多元概念也培養她能夠從多元觀點來包裝、切入單一事件，使她關心的議題成爲主管所肯認的題目。透過這樣的「故事」，沛莉爲她的女性主義實踐行動和信仰做了一個明晰扼要的例證，將她所處的女性主義社群共享的道德義務和實踐精神加以具體化，展示當碰到社會中不平等的性別對待時，可以透過何種積極行動來導正偏差的社會視聽，以求得性別正義的擴展。

這一路由沛莉主導的敘事過程中，仔細審視敘事的順序，我們可以看到從意識揚升走到實踐行動的女性主義社群主流敘事情節輪廓的影響。如同 Roberto Franzosi (1998: 533)所言，敘事順序從來就不單純 (innocent)，其生產總是和意識形態的生產相連結，因此，敘事的順序也意味著因果的順序。所以，沛莉的敘事順序所意味的因果性，也顯示了其社群盛行的因果命題：因爲意識揚升，所以實踐改革。因而沛莉才會在敘說、展示自己的女性主義意識之後，馬上以一個實踐故事來證明自己的認同。

然而，如此的實踐故事並非沛莉敘事的全貌。在上段故事的最後，沛莉把討論的場域轉到她轉職後的另一間媒體組織，話鋒一轉的說，在那裡，她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白目，就是可能也沒有辦法那麼勇敢」的去捍衛自己的想法。這句話營造出了一種奇異的對比，在先前組織中理直氣壯和據理力爭的行動，到了後來的組織卻變成一種「白目」行爲。爲了解釋這個對比，沛莉以一段「紀要」來描述該組織以聳動、走偏鋒作爲報導賣點的特質：(1)報導對象的挑選爲男不如女，老不如少，老死不如橫死；(2)報導題材要滿足社會大眾窺私密的慾望；(3)窺私密的標準爲隱善揚惡，且愈具反差形象的負面消息愈受歡迎。這段「紀要」鮮明的對照出沛莉所任職的前後兩個媒體組織間的差異，前者因溝通管道暢通而較能容許多元的聲音，後者則以商業邏輯的銷售取向作爲組織生存的唯一準則。爲了讓聽者進一步理解如此的商業邏輯如何讓自己「沒有辦法那麼勇敢」的去捍衛女性主義的堅持，沛莉描述了一個身邊同事因對組織處理特定新聞的態度感到不滿，因而私下和她抱怨的「故事」，在「故事」尾聲，沛莉道出一種

兩難的困境：

每次發生他們以女體在炒作新聞的時候，她就會覺得很看不慣。可是她這種東西是跟我才講啊，她怎麼可能說走到總編輯辦公室去抗議說「我受夠了！」不可能啊，大家都是有生計的壓力了嘛。老實說你就是賺口飯吃嘛，你怎麼可能說拿一個砸飯碗的動作去爭取某種正義感，不可能嘛。當你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反正你還有父母可以依靠的時候，你是可以很有個性的去抗議一些什麼事情。可是當她是一個有家庭的人，她有兩個小孩要養之類的，或者她還要奉養她的父母親的時候，她是需要這個薪水的啊。……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就是說你那種抗議啦、你受不了看不慣的東西，它不再是像說你在課堂裡面你是可以用一種討論的方式，師生共同討論，或者你因為大家地位是平等的，所以你可以去說「我覺得你這樣的想法很奇怪啊！」；或者你用一個打工者的角度「大不了我就走了，我就是要說你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不是的，你在職場上你要考慮到是你要領人家薪水這件事情，所以很多事情她很可能只能跟她的比較好的同事去 complain。（訪談記錄 F16）

當職場環境不再是扁平化的管理，而是嚴格的科層組織；當媒體氛圍不再容許多元的聲音，只以商業邏輯的數字作為訴求；當自己的肩膀扛著生計的壓力，需要衡量每一個行動的得失損害時，我們得以明瞭「白目」和「不勇敢」在這個場域裡的意義，也得以明瞭實踐改革的故事並不能普遍同質的存在於每一個媒體組織之中。面對這樣的困境，沛莉自嘲自己也成了罔顧性別正義的「共犯」。如此的嘲諷雖令人心驚，卻也不令人陌生。回顧在校園中接受的女性主義教育，那些與壓迫體制站在同一陣營，且毫無自覺和反省的人總會被稱為共犯。而當行動者在女性主義的教育洗禮中被期待負起性別改革的道德

義務，卻迫於環境壓力難以使上改革的氣力，而與性別不正義的體制同流，自然便會將自己歸為「共犯」結構中的一分子了。如此身為「共犯」的壓力，也曾經讓沛莉自我懷疑「不夠」女性主義、「不夠」具有實踐道德感，因而她以「自詰」的形式說道：

我自己也曾經會有那種焦慮，就是說你看人家過得這麼苦的日子，一直在實踐啊，然後要去運動啊，就是真的生活即實踐，然後又去做這樣子的運動，真的很為這個女性主義付出很多，甚至她的整個生命都是貢獻出去。感覺她們就比較崇高，因為理想性很高。那我們相對之下就會覺得，唉，你看我們過得這麼舒服啊，還可以來喝個下午茶幹嘛的，人家可是在那邊運動打拼呢，什麼之類的，然後又沒有領什麼錢啊，有些運動團體沒有錢嘛，薪水很少很低，然後都是過時的工作啊，就是為了這個運動付出她們所有就對了。然後我們在那邊還有薪水可以領，還可以講究一下生活品質，你就會覺得，唉，自己真的不夠稱為是一個女性主義的運動者。

（訪談記錄 F16）

沛莉所描述「比較崇高」的女性主義者的形象，其實正是女性主義社群共享的婦運行動者的故事典範。這些典範在重複講述的過程中成為這個社群的記憶基模，讓她在形構實踐故事的輪廓時，特別偏好如此的形象，也特別容易觀察到如此的範本，並透過和此形象的對話，來評價自我的行動是否達成了社群共享的歷史天命和道德責任。所以，沛莉在典範的標準下會自詰自己的不足，陷入懷疑和責備自我的焦慮之中。由於沛莉是用過去式來描述這股焦慮，因而我詢問她如何解除焦慮，她先是大笑表示「就是認清自己，你就是沒辦法」，接著馬上正色的以三段「宣言」形式吐露自我反思後的結論，而其核心意旨便是圍繞著尊重多元——正是她開頭所談的女性主義帶給她的最大啟發——的概念來談，意即，如果尊重多元的價值是女性主義的基

本精神，那「它就不應該是大家一起穿制服的去遵循某些規則」，而應該是一種每個人用各自舒服、自在的方式去呈現的信仰。因此，在實踐的方式上，沛莉也希望在「最衝撞」的方式以外，仍能夠以「某種程度做得舒服的實踐，來對婦女運動做出貢獻」。

綜觀沛莉的敘事，她在訪談中想傳達的自我理解，是一種將女性主義的信仰融入生活的實踐者。因此，在訪談最開頭，她透過「故事」和「紀要」的形式，從日常生活的觀察來談論主流社會的美貌標準及她的反思，自然而然的流露她的女性主義涵養。接著，當她面對職場中的實踐受挫經驗時，為了讓聽者理解她的切身感受，她以最具體的「故事」形式來傳達成人的生計壓力是實踐中不可輕拋之重，因而成爲了實踐道路上的羈絆。而當此羈絆讓她身懷「共犯」的罪惡時，她以「自詰」形式帶領聽者一同體會她內心的焦慮；最後，爲了重新凝結因「自詰」而混亂的自我認知，沛莉透過反省後的「宣言」形式來重申女性主義的多元呈現方式，再度將自己定位爲在生活中以自在方式「做女性主義」的實踐者。

而將沛莉的故事放回她所坐落的女性主義社群，我們看到社群共享的文化框架寫入她的生命，爲她在描繪自我認同和實踐經驗時，提供一個基礎的敘事情節輪廓，讓她循著意識揚升到實踐行動的情節，來架構自我生命中接觸女性主義的經驗。同時，我們也看到此文化框架中的道德使命感銘刻進她的認知，讓她在媒體職場中遭遇實踐阻礙時衍生「共犯」的自嘲；也看到女性主義社群流傳的故事典範形構她選擇對話、觀察和比較的對象，因而在相互映照之下萌生自己「不夠稱爲是一個女性主義的運動者」的歉疚。閱讀沛莉的故事，我認爲最引人深思的啓發在於，沛莉在「自詰」後根據女性主義教育培養的尊重多元的概念所做的反思，引領我們去反省，女性主義社群所共享的運動故事是不是塑造出太過單一的形象，以致於它好似形成了某種規範或教條，讓社群成員忽略在女性主義抗拒壓迫的多元主張之下，其實還可以有更多自在的實踐形式。如同蘇芊玲(1998: 100)所言，「決裂的、革命的、是非分明的論述與行動號召自有其迷人、撼動人心的

力量，但我並不太相信生命可以那麼分明絕對，因此我更期待女性主義婦運的複雜化與細緻化」。而此複雜化與細緻化的展現，就是透過真實經驗的貼心分享（蘇芊玲 1998: 250），來給不同女人實踐的空間（蘇芊玲 1998: 99）。因此，如果此女性主義社群有更多管道讓不同形式的運動故事都能被看見、流傳、記憶，甚至藉此擴大、異質化「運動」的定義，那麼身處於其中的成員就能擁有更多樣的記憶基模，也能看見、欣賞更多元豐富的實踐樣貌和典範。那麼，如同沛莉這種因為比較對象的單一化而衍生的歉疚感，就能夠化為更為靈活彈性的實踐力量，真正讓女性主義尊重多元異質的信仰，在我們實踐的道路上落地生根，開枝散葉。

## 五、結論

如前所述，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道德空間中，並以此空間賦予我們的框架來理解自己的定位。而敘說一個故事不可避免的會採取一種道德姿態(Bruner 1990: 51)，並以此姿態來劃分對錯，將自我含括和排除於特定的社會空間(Hastrup 2003: 316)。「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敘事，就是在特定社會空間和道德姿態下的產物。它除了反映一種認同和實踐行動的自省愧疚，也反映了這個道德姿態所據以浮現的歷史和文化脈絡。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去關注創造個人敘事的情境、脈絡及其所鑲嵌的結構關係，我們可以從此詮釋的角度看到更多深刻的觀點，也揭露出更為多重的事實。

如同 Patricia Ewick 與 Susan S. Silbey (1995: 199)所指出，敘事研究有兩種關懷：(1)在認識論層次上主張社會認同和社會行動都是透過故事來建構的；(2)在政治層次上認為敘事本身具有顛覆和改造社會世界的潛力。「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同樣也具有這兩種層次的關懷。首先，在認識論層次上，本研究關注當行動者面臨一系列女性主義認同和實踐的事件時，如何在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下組織其間的關係，並透過情節賦予的方式來詮釋事件的意義，且由此來形構

自我的認同。因此，研究的焦點在探看行動者如何運用特定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來創造自我的行動和認同，或曰，將什麼樣的隱喻應用在自己身上(Ringmar 1996:75)。

透過如此的關注，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中，艾瑪、小英和沛莉都沿用了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來為自己的經驗賦予情節，將生命中發生的事件以「紀要」、「故事」、「自詰」和「宣言」四種敘事形式組織起來，從而描繪出一個可理解的、一致的自我組態(configura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情節發展的設定和敘事形式的編排並非任意安排的，而是行動者鑲嵌在特定文化脈絡下，既受結構的文化框架所影響，又在其中進行反思性監控的一種社會實踐的創作。確切的說，受到女性主義文化框架中的主流情節輪廓和故事典範的影響，艾瑪、小英和沛莉都將自己的行動詮釋成「不夠女性主義」；而在此詮釋的過程中，她們又以各種不同的敘說形式來解決敘說中的問題意識：「紀要」以快照的方式呈現敘說者的生命歷程，「故事」用身歷其境的方式讓聽者體會特定事件的經過，「自詰」呈現敘說者內心的疑惑與掙扎，「宣言」則是反思後的重整旗鼓，將自我認同重新凝結成一體並達成自我說服的展現。藉由這四種形式的交替轉換，她們激起了聽者的想像力，進而達成同情理解和說服的工作。雖然這四種敘事形式並不專屬於道歉敘事的特定結構，但它的確是在特定的脈絡和互動過程中出現的。在訪談的互動中，要讓聽者既概略又細緻的理解自己的經驗，「紀要」和「故事」的交互穿插是適切的；而在女性主義文化框架的影響下，其意識啓蒙走向行動改革的情節輪廓，塑造了一股在意識面反思，於行動面改革的氛圍。因此，當敘說者要表達自己的認同與實踐經驗時，便會以「自詰」來彰顯內心經歷的反思，用「宣言」來確立自己實踐的行動。所以，這四個敘事形式的分類，述說的並不只是語言的結構，更是一種鑲嵌在特定脈絡下的社會行動。藉由檢視此分類在敘說中的位置，我們可以看到故事文本如何鑲嵌於社會關係之中，並在此社會溝通的過程建構了敘說者的社會認同。

因此，回顧這三個道歉敘事，我們可以看到艾瑪雖自責自己的消極，但藉由「宣言」和「故事」、「自詰」的相互交錯，展示了女性主義在她生命中引起的反省力道，因而肯定了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小英雖自嘲她的退縮會讓教導女性主義課程的老師大失所望，但也透過「宣言」的表述來反省女性主義實踐的能與不能，進而確立自己的女性主義認同；沛莉雖焦慮自己沒有將實踐運動擺放在生命中最重要位置，但也從「宣言」的反思和整理中，確認自己信仰的女性主義認同和實踐邏輯。由此可見，道歉敘事雖是表達自我的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經歷，但它並不只是行動者用以敘說如何「做女性主義」的工具，而是選擇怎麼說和說什麼的敘說行動本身，就是使其生命經驗變成一種可被說明的成就，並從此企圖說明的過程，為自己在女性主義社群中找到一個定位。因而，敘說的本身就是一種「做女性主義」的行動。

再者，當敘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動時，它不僅只是單純反射主流意義和權力關係，它同時也構成了意義和權力關係的生產(Ewick and Silbey 1995: 211)，此即為敘事研究在政治層次的關懷：透過敘事來改造社會世界的可能性。敘事總是在公共的時間中展開，它所承載的時間從一開始就是和他人共存(being-with-others)的時間。因此，透過敘事的傳遞，我們看見了一個社群試圖在接續某種 Hans-Georg Gadamer 稱之為傳統的東西(Ricoeur 1981: 185)。「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所演示的，便是女性主義的文化傳統。它一方面提供了象徵、語言和範例來讓人們的行動和敘說變成可理解和可詮釋的，另一方面也透過人們的一再敘說，而再構其規範性的權力地位，形成影響人們去建構何為女性主義者（及女性主義實踐）的權力來源。因此，在艾瑪、小英和沛莉的敘事中，我們都看到女性主義文化框架中的「積極、抗爭、運動實踐」的主流故事典範，構成了她們用以組織和詮釋生命中的事件的情節；而透過此情節組織而成的「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也轉而再製主流故事典範的可欲性和正當性。Ewick 與 Silbey (1995: 213-214)稱此為一種「殖民於意識」(colonize

consciousness)的行動，意指社會中流傳的故事能作為一種社會控制和意識形態滲透及同質化的力量。因此，即便艾瑪、小英和沛莉在其生命經驗中有不同的實踐歷程，但女性主義主流故事中蘊含的「殖民於意識」的潛力，使她們以某種特定的形象來作為理想女性主義者的範本，然後在自我情境的特殊性與理想典範的普遍性之間搖擺掙扎。若我們忽略如此的掙扎，而僅僅將其詮釋為歉意的內觀自省，就等同於關閉了審視此理想標準建構過程的可能性，同時也鞏固了女性主義社群中的故事典範的地位，使其持續成為人們建構女性主義者及女性主義實踐行動定義的規範性指南。如此一來，許多未說的、無法述說的、或不敢述說的經驗和感受，都會在這些規範性指南的框架下隱身，最後，當然也就無法擴展複數的女性主義「可能的生活」會是如何的想像藍圖了。

然而，要擴展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想像藍圖，也不僅只是說出更多被規範性指南隱身的故事而已。敘事若要具有改變世界的潛力，便要將個人特殊的經驗連結成為根植於一個包含文化、物質和政治世界的一部分；亦即，將敘事中呈現主觀經驗的說詞鑲嵌於一個更大的社會關係之中，如此才能從敘事中揭露個人生活的集體結構性(Ewick and Silbey 1995: 219, 221)，進一步引發個人和社群對其的察覺和批判，如此一來，也許就能夠改變個人建構自我認同的方式，同時也會改變個人如何與他人談話和與社會秩序互動的方式(Rosenwald and Ochberg 1992: 2)。探討「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的道歉敘事，正是企圖展示這種個人與社會的連結。將原先「歉意的自省」的個人煩惱與其坐落的社群文化連結起來，我們一方面看到個人生活的具體描述，另一方面也看到其所鑲嵌的社會生活的限制性和能動性。換言之，如此的對照閱讀能讓我們從個人的小宇宙帶往社群文化的大宇宙（宏觀世界）(Franzosi 1998: 550)，並透過如此的連結，讓我們重新提出和思索女性主義發展的公共議題。

而此議題的公共性，不僅在於累積更多元豐富的女性主義實踐經驗，以讓我們擴展女性主義既有的實踐工具箱及故事典範，更在於從

關注如道歉敘事這樣的挫折經驗中，去反省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是否有改變的可能。如同王瑞香(1997: 167)曾提及，在日常生活中男性對女性的冒犯總令她憤怒異常但卻苦思不得應付要領，因而常萌生壓抑之苦。這些類似的挫折經驗並不常見於女性主義的主流敘事之中，但重要性卻在於它顯示了人們即使沒有實際行動，但內心自我認同的奮戰也從未休止。因此，重視這些內心的認同戰爭，不但能讓我們看見女性主義如何深刻的寫進個人生命，更能讓我們從反省中思索女性主義進步的可能性。如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認為，生活是一個可被塑造的文學。雖然過往的事情不能被改變，但我們可以改變將這些過往與現在連結起來的敘事，如此一來，即便是過往的意外也可以轉化成行動，亦即，轉化成我們願意負責的事件(Polkinghorne 1988: 154-155)。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關注各種成功或挫敗的實踐故事，並藉此反省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如此一來，原先只屬於個人成敗的實踐經驗，便能夠成為鑲嵌於女性主義社群之中的集體故事，進而反饋於女性主義的文化框架，使其產生改變的可能性。而這不但會改變我們對過往的詮釋和評價，使我們對這些經驗有另種敘說的可能性，且這些對過往的另類詮釋也會開啓未來生活的可能性(Riessman 1990: 220)。女性主義的發展，因而將有可能擁有更多元異質的豐富面貌。

誌謝：感謝蕭阿勤教授和獨立研究學者陳儀芬對本文初稿提供的寶貴建議；也感謝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林鶴玲和口試委員吳嘉苓、方念萱老師對田野資料所提供的洞見；還有四位審查人和編委會詳盡的評論與建議，以及謝麗玲編輯在編務上給予的建議與協助也一併感謝。當然更感謝說故事給我聽的所有受訪者，她們賦予了這些故事生命。本文的任何缺失皆由作者自負。

## 參考文獻

- 王瑞香(1997)一個女人的感觸。台北：女書文化。
- 王雅各(1998)大學學生社團中男性社員的性別意識及其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 9: 245-277。
- 王儷靜(2004)師範學院兩性教育課程授課教師教學信念之探究。教育學刊 22: 129-150。
- (2005)修習性別教育課程對師院生性別意識影響之探究：以札記寫作爲媒介。教育學刊 25: 155-176。
- 卯靜儒(2004)理論化女性教師的性別意識與認同建構過程。通識教育季刊 11 (1&2): 147-170。
-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著，張君玖、劉鈞佑譯 (1995) 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 李元貞(1986)婦女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婦女新知 53: 4-6。
- (2005)序·無情天地有情女——記愈戰愈勇的女書店姊妹。見鄭美里、羅惠文編著，紫色桃花緣——女書店故事話從頭，頁 14-17。台北：婦女權益基金會。
- 呂秀蓮(1990[1974])新女性主義。台北：前衛。
- 沈松橋(2009)中國的一日，一日的中國：一九三〇年代的日常生活敘事與國族想像。新史學 20(1): 1-59。
- 余貞誼(2005)性別意識的認同與實踐：以媒介職場的實踐經驗爲例。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昱貞(2001)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兩位國中女教師的性別意識與實踐經驗。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芳玫(2003)彩色與無色：女性主義者多重身分的衝突與對話。歷史月刊 188: 94-98。
- 邱天助(2007)老人集體生命史研究：老年生活紀事的敘事分析。東亞研究 38(2): 46-84。
- 范雲(2010)說故事與民主討論——一個公民社會內部族群對話論壇的分析。台灣民主季刊 7(1): 65-105。
- 范碧玲(1990)解析台灣婦女體制：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性格之分析。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 柯惠鈴(2007)軼事與敘事：左派婦女回憶錄中的革命展演與生活流動

- (1920s-1950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5: 141-162。
- 洪慧真、洪志成(2009)靠近 VS. 疏離——問題導向學習教師自我敘說新的看見。中華教育 60(2): 48-63。
- 胡紹嘉(2005)于秘密之所探光：遭遇的書寫與描繪的自我。應用心理研究 25: 29-54。
- (2006)逆想人文社會科學寫作：來自小說敘事研究的啓迪與演示。中華傳播學刊 9: 275-302。
- 郭美芬(2011)二十世紀初澳洲都市化下華裔社群的「華僑」敘事與政治結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71: 157-202。
- 陳佩英(2004)意識與行動——台灣婦女／性別研究建制化歷程之探討。通識教育季刊 11(1&2): 39-72。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 17: 51-84。
- (2004)女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通識教育季刊 11 (1/2): 111-138。
- 張毓芬(1998)女人與國家——台灣婦女運動史的再思考。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輝潭(1995)台灣當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實踐初探——一個歷史的觀點。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組碩士論文。
- 黃燕萍(2001)我是誰？——一個女準教師性別主體意識的啓蒙過程。新竹：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游美惠(2002)性別意識、使命感與教師專業成長：以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動為例。教育研究資訊 10(6): 45-62。
- 彭滄雯(2006)從女廁運動到無性別廁所——一個參與者的反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34: 76-84。
- 楊幸真(2007)女性主義教師與校園生活。教育學刊 28: 169-193。
- 楊秀宜(2008)一位少年殺人犯的生命經驗之敘事研究。諮商輔導學報 18: 1-31。
- 劉惠琴(2002)助人專業與性別實踐。應用心理研究 13: 45-72。
- 蔡琰、臧國仁(2010)爺爺奶奶部落格——對老人參與新科技傳播從事組織敘事之觀察。中華傳播學刊 18: 235-263。
- 謝小苓、陳佩英(2006)從蟄伏到躍動——校園女權運動專題導言。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34: 10-27。
-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 5: 195-250。
- (2005a)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 9: 1-58。

- (2005b)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和國家權力。文化研究 1: 97-129。
- 蕭昭君等(2002)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意識成長歷程與實踐。台北：女書文化。
- 蕭昭君(2004)誰需要女性主義的教育？一個師資培育者自我解放的敘說研究。通識教育季刊 11(1&2): 171-198。
- 蕭昭君、林昱瑄主編(2007)解放校園行動筆記。台北：女書文化。
- 鄭漣炆(2001)女性教學者女性意識轉化及其教學實踐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美里、羅惠文(2005)紫色桃花緣——女書店故事話從頭。台北：婦女權益基金會。
- 顧燕翎(1993)從週期理論與階段理論看我國婦女運動與女性意識的發展（下）。律師通訊 170: 64-73。
- (1996)婦女運動與公共政策的互動關係——墮胎合法化與平等工作權策略分析。見徐正光、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頁 151-174。台北：三民。
- (2005)女性主義的體制內實踐——我在公訓中心的四年。婦研縱橫 76: 57-66。
- 蘇芊玲(1998)我的母職實踐。台北：女書文化。
- (2004) 3+3+3+1：女書店走過十年。婦研縱橫 71: 76-83。
- Abbott, Andrew (1992) What Do Cases Do? Some Notes on Activity in Sociological Analysis. Pp. 53-82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harles C. Ragin and Howard S. Bec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ker, Scott (1990) Reflection, Doubt, and the Place of Rhetoric in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8(2): 232-245.
- Barthes, Roland (1977)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Pp. 79-124 in *Image, Music, Tex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rtlett, Frederic Charles (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Howard S. (1992) Cases, Causes, Conjunctures, Stories, and Imagery. Pp. 205-216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harles C. Ragin and Howard S. Bec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har, Ruth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 Boston: Beacon Press.
- (2003[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tenth anniversary ed. Boston: Beacon Press.
- Blackwood, Evelyn (1995) Falling in Love with an-Other Lesbian: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in Fieldwork. Pp. 51-75 in *Taboo: Sex, Identity, and Erotic Subjectivit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edited by Don Kulick and Margaret Willson.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1)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Brown, Richard Harvey (1990) Textuality, and the Postmodern Turn in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8(2): 188-197.
- Bruner, Edward M. (1986)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Pp. 139-155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edited by Victor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runer, Jerome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4(1): 11-32.
-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London: Routledge.
- Cassell, Joan (1989) *A Group Called Women: Sisterhood and Symbolis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Chen, Peiyong (2004) *Acting "Otherwis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Women's/ Gender Studies in Taiwan's Universities*.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Ewick, Patricia, and Susan S. Silbey (1995) Subversive Stories and Hegemonic Tal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Narrative. *Law & Society Review* 29(2): 197-226.
- Flax, Jane (1983)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atriarchal Unconscious: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 Pp. 245-281 in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Dordrecht, NL: D. Reidel.
- Franzosi, Roberto (1998) Narrative Analysis—Or Why (and How) Sociologists Should be Interested in Narra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517-554.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Stanford

- University Press.
- Haraway, Donna J.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andra (1987a) Introduction: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Pp. 1-14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7b) Conclusion: Epistemological Questions. Pp. 181-190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tsock, Nancy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p. 283-310 in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Dordrecht, NL: D. Reidel.
- Hastrup, Kirsten (2003) Violence, Suffering and Human Rights: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3(3): 309-323.
- Holstein, James A., and Jaber F. Gubrium (2000)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oks, bell (2000)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2nd ed.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Jacobs, Sue-Ellen (1989) Foreword: Then and Now. Pp. vii-xvii in Joan Cassell, *A Group Called Women: Sisterhood and Symbolis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Kerby, Anthony Paul (1991) *Narrative and the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Kandiyoti, Deniz (1991)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Pp. 104-118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dited by Judith Lorber and Susan Farrell. Newbury Park, CA: Sage.
-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ishler, Elliot George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Chandra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 Discourses. Pp. 51-80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Natanson, Maurice Alexander (1970) *The Journeying Self: A Study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Rol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Nelson, John S., Allan Megrill, and Donald N. McCloskey, eds. (1987)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Nespor, Jan, and Liz Barber (1995) Audiences and 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 Pp. 49-62 in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edited by J. Amos Hatch and Richard Wisniewski. New York: Routledge.
- Ong, Aihwa (1994)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Pp. 372-381 in *Theorizing Feminism: 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Anne C. Herrmann and Abigail J. Stewar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eds. (1989)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Livia (1989) *Telling the American Story: A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Polkinghorne, Donal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abinow, Paul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92) Introduction: Cases of "What Is a Case?" Pp. 1-17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harles C. Ragin and Howard S. Bec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bbens, Jane (1989) Interviewing: An "unnatural situa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2(6): 579-592.
- Richardson, Laurel (1990)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1): 116-135.
- Ricoeur, Paul (1981) Narrative Time. Pp. 165-186 in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1990) *Divorce Talk: 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 Ringmar, Erik (1996)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d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aldo, Michelle Zimbalist (1980) The Use and Abuse of Anthropology: Reflections on Feminism an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5(3): 389-417.
- Rose, Hilary (1983) Hand, Brain and Heart: A Femin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9(1): 73-90.
- Rosenwald, George C., and Richard L. Ochberg (1992) Introduction: Life Stori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Self-Understanding. Pp. 1-18 in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edited by George C. Rosenwald and Richard L. Ochber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Dorothy (1987) 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Pp. 84-96 in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Issues*, edited by Sandra Har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 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UK: Blackwell.
- Stanley, Liz, and Sue Wise (1993) *Breaking out Again: Feminist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edon, Chris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91) Doing Gender. Pp. 13-37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dited by Judith Lorber and Susan A. Farrell.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White, Hayden (1980)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7(1): 5-27.
- Winch, Peter (1990[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網站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http://sex.ncu.edu.tw/history/history.htm>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 [http://cc.shu.edu.tw/~gndrshu/web/about\\_01.htm](http://cc.shu.edu.tw/~gndrshu/web/about_01.htm)

世新大學性別平等教育中心 <http://cc.shu.edu.tw/~gndrcom/frameset.htm>

成功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室 <http://www.ncku.edu.tw/~gender/about.htm>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http://gender.nknu.edu.tw/html/c1.html>

高醫大性別研究所 <http://www.kmu.edu.tw/~gigs/intro/research.htm>

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 <http://rpgs.hss.nthu.edu.tw/html/introduction.html>

臺大婦女研究室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12\\_2.php?cat\\_id=127#](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12_2.php?cat_id=127#)

臺大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 [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05\\_1.php?cat\\_id=107](http://gender.psc.ntu.edu.tw/Gender/page/page_05_1.php?cat_id=107)